

復員建國的急務

周佐治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 復員建國的急務

## 目次

一、抗戰，復員，建國·····	一
二、軍隊國家化·····	二〇
三、政治民主化·····	三四
四、經濟的安定與新生·····	五二
五、交通的維護與發展·····	七二
六、教育的改進與普及·····	八五
七、衛生的革新與擴展·····	九六

復員建國的急務 目次

二

八、結語

一〇四

# 復員建國的急務

周佐治著

## 一 抗戰，復員，建國

八年來的抗戰不曾給新生的中華民族一次偉大的空前的血的洗禮與火的陶鑄，好像歐洲傳說中「再生的鳳凰」，經過了血的洗鍊，火的煎熬，反能夠孵育出茁壯的雙翼，向着理想的，遼遠的碧海蒼空自由的翱翔。因此，這一次的抗戰在綿延亘長的五千年歷史當中應該踞着最光榮的寶座，而成爲劃時代的指標；不僅如此，它在四億五千萬同胞的心靈深處烙印下不可磨滅的疤痕，使他們體認到勝利的成果，並非倖致。

固然，我們不是戰爭的謳歌者，說什麼「戰爭乃一切之父」；但，無可否認地戰爭確是革命的插曲，或者更可以說，戰爭與革命是一事的兩面，造因與結果都是互有關連。

• 誠如黑里偉 (H. Haevy) 在世界危機 (The World Crisis, 1914-18) 一書中所說：

「世界上歷來一切重大變亂，戰爭與革命二者，往往是同時兼備的，尤以現代歐洲爲然。」

這是他開始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醒目的說明。其實，何僅歐洲如此，世界各地莫不皆然。因爲在現實的世界中，如果孕育着革命的種子，那就難免不爆裂成爲戰爭；而戰爭的結果又往往促成革命的成功。所以，戰爭乃是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它不能孤立於革命的範疇以外。就本國最近百年的史乘來說，由於清廷的專制腐敗，招致帝國主義者的覬覦，豆剖瓜分的危機潛然四伏，民族革命的思潮乘時而生，與帝國主義的利益針鋒相對，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從而一方面是革命浪潮的掀天動地，另一面是帝國主義的橫加阻撓。爲着民族的生存，爲着革命的成功，戰爭遂成爲必經的歷程。試看甲午（一八九四年）一役之後，清廷的喪師辱國已達到不能忍受的最高峯，帝國主義窮凶極惡的面目全部暴露無餘。於是趨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由宣傳而見諸行動，由行動而見諸事實。可是，新中華民國的誕生，假若是真正的民族復興的前奏，那對於以東

亞爾主自命，以鯨吞蠶食中國為目標的日本，無疑地是絕大的阻礙。因此，辛亥革命的完成，就是對日戰爭的開端。蔣主席在二十九年國慶紀念日就剴切的昭示：

「自辛亥至今，中國建國事業之所以如此遲鈍延遲沒有繼辛亥而完成者，其最大癥結就是因為有日本軍閥這一重大的障礙。」

由於強盛統一的中國是日本軍閥遂其侵略野心的障礙，而積極侵略的日本軍閥是中國完成建國事業的障礙，從而一部民國史可以說純粹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史，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革命奮鬥與日本侵略野心的對照史。當民國成立伊始，日本就以五路建設權作為承認的條件，接着又發動借款作為袁世凱鎮壓革命的本錢，漸滅了第二次革命的勃興和發展。迫歐戰爆發，日本悍然出兵山東，並提出二十一件作為扶持袁氏帝制成功的交換條件。袁氏既死，又以西原借款製造中國的內亂。馴致于戈連年，國家元氣大形斷喪。為着國家統一，拯生民於水火，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日本便露骨的演出濟南事件，不惜的以武力作阻撓。但革命的浪潮不是任何的堤防所能範圍和阻塞的，在艱辛萬難

的局面下，北伐終究完成。北伐的完成不啻是革命勢力洶湧澎湃的表現，而革命勢力的增長是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相盪相決極不相容的。九一八，一二八就是這種衝突的序幕，七七盧溝橋事變就是中華民族求獨立和生存與日本帝國主義用暴力征服兩大力量對峙的展開。

追蹤索跡我們可以說這一次的抗戰是國民黨繼承辛亥革命的餘緒，北伐統一的精神來完成的偉大民族獨立的工作。換句話說，抗戰是國民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也是我們革命造其因，也是我們革命結其果，這亦即是說抗戰的勝利是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必然的收穫。

戰爭與革命既不可分，而戰爭的成果亦惟有在革命的前進中來葆愛，來發揚，要這樣才能消滅戰爭的導因，才能保持世界的和平。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煙火漫天的情況中結束時，人們警惕於戰爭的殘酷，無不希冀保持永久的和平，以免人類再蹈一次大戰的覆轍。可是，由於戰勝國不能認識一個世界戰爭的革命性質，以及激動這個戰爭的革命

所具有的特性，只知道一味的眷戀過去，馳神於戰爭未誕生前的繁榮，將潛滋暗長的革命潮流遺視勿睹，結果鑄成第二次大戰的惡果。和平之條件（Conditions of Peace）的作者卡爾（E. H. Carr）說過：

「一九一九年和議之無當，是由於那般締造和議的人們未能認識當代的革命。從過去回顧中，我們不難了解，資本主義競爭下日趨緊張的局勢，乃是造成一九一四年人類浩劫一個最大基本的原因。從上次大戰到這次大戰，人們一直爲一種矛盾所迷惘，那就是協約國「贏了勝利」，卻「輸了和平」。在那二十年當中，兩個在一九一八年一敗塗地的大國，在復興工作上有了驚人的進展，且進而執掌歐洲政治的牛耳。至於一九一八的戰勝國呢，則呆立一旁，無可奈何，此中原因，不止一端；美國與和議的侷離，協約國彼此的爭權奪利，希特勒的狂暴作風，英國的解除武裝與因循姑息，凡爾賽條約的過分苛酷不足……種種說辭，不一而足，所有這些全是皮相之論，未曾窺見事實真相。蓋戰勝國家所以輪却和平，



而蘇聯，德國所以贏得和平之故，乃因前者一味墨守，有時甚且奉行那早已過時的國家權利與經濟放任主義的理想，而後者輒能認清二十世紀的革命潮流，於有意無意之間循之前進，企圖以集中計劃與統制的方式，建立單位較大的世界。←

固然，集中計劃爲統制的方式，並不是極理想的贏得和平永平的辦法，不過在歐洲大戰後的荏苒韶光中，各戰勝國家咀嚼着勝利的殘果，回顧着過去的光榮，聽任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日趨於懦弱無能，資本主義的放任自由更趨極端，釀成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的交織，自身補苴之無暇，遑能顧及於其他。於是德，意，日等用強權統制的國家，遂能整軍經武傾洩其瘋狂的侵略慾，第二次人類的悲劇不能不一幕一幕的揭開。

中國是第二次人類浩劫中最先受侵略和犧牲最慘重的國家，可是在近二十年當中，她是能夠迎合新的革命潮流，高瞻遠矚，以新的民族，政治，經濟的觀念來建築新的社會的前進者。由於這種前進的思想會招致強盛的中國之出現，以及進而可以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柱石。因此，近居東鄰，虎視眈眈，一心以黷武主義來侵略東亞，征服世界的

日本帝國主義遂先伸其魔掌給予無情的壓迫，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推殘中國工業，破壞中國統一的行爲上莫不盡其宅心叵測的能事。中國的建國大業終至於淹漉歲月，不能積極的完成，導因在此。但是一種能夠內合國情外應世界潮流的革命思想，只要經宣傳而深植於人心，這就是莫大的力量，好比是大地之下的暗泉一樣，牠本身具有澎湃衝射的威力，只要有罅隙牠就會噴射而出，使大地立成爲水晶的世界。日本帝國主義默察這種力量的不可侮，乃訴諸於武力征服的最後手段，想將這種前進的革命思想根除株滅，將中國淪爲永久的附庸。然而當時的西方諸國不能體認中國國民革命前途的偉大，不能理會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真理所在，互相還在勾心鬥角追逐舊式國家權利的把持，合作既不可能，制裁干涉復成爲夢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造因，於茲發軔。

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也自然不會有將來。國民黨五十年奮鬥的經歷，以及最近八年來領導抗戰的慘痛經驗，這就是我們的過去。怎樣珍視勝利的成果，怎樣在世界潮流中來完成復員建國的工作，這就是現在。由中國的強大成爲遠東和平的柱石進而促進

入世界的永久和平，這就是將來。如何把握現在以期實現將來，便要以復員建國工作的成績來當作攷驗的試金石。

記得有一個英國作家說過，動員的效果要由復員的結果來衡量，這就是說復員的工作比動員工作來得更爲繁難，因爲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人們的感情由於愛國心的驅使，而達到激動的最高潮，無論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都容易達到爲戰爭而動員的預期成效。同時假使戰爭是有光榮和正義的責任，使人人都懷有必死的決心來担負，來完成，那麼動員的效果更會在社會各方面表現良好的反映。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論到「國家與民族的強盛」時，對於有偉大目的的戰爭曾寄予莫大的讚美，他說：

「沒有人能不運動而獲得健康，而政治的個體亦與自然的人體相同，所以一次適當而光榮的戰爭正可稱之爲一國或一族的良好運動。內戰的發生，固然是如患熱病者的發熱一般有害於健康；但是對外的戰爭，却猶如運動時所發生的體熱，能加強

體力。因爲在一個安嫻的和平生活中，人民的勇氣會趨於消沉而社會的習俗也將日形腐化。L

運動可以增加體力，但運動後的疲勞，却正和戰爭結束後人們心情的鬆懈和放弛一樣，有着一種自然的阻力。復員的困難就往往由於這種阻力的作祟使復員不能達到理想的程度。

前面說過戰爭是革命的插曲，兩者有着不可分離的關連，但革命的進展，由於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不斷的變動，不停的前進，它的任務是連續的，綿延的，尤其是要根絕下一次戰爭的再度來臨，革命的本質就要件隨着時代的趨向而有所適應。因此，我們可以說，戰爭的任務有時而終，但革命的任務則無時或已，人類社會要想達到和平，康樂的理想境界，必須遵從這不可越犯的準則。由於此一論點的推演，我們對於作爲戰時渡到平時不可少的復員工作，負有怎樣嶄新的意義和如何艱鉅的任務，不難想像得到。其實，不管復員工作何等作法，但在大戰之後，所有從前舊的社會秩序必非本來

面目，也決非本來面目；因為戰爭的破壞，使沒落的舊社會形態不能立足，同時由於戰爭的激盪，無形中發育了新的需要和願望，為未來的社會決定了政治的經濟的形態。有人說過：「社會形態是戰爭經驗的反映，又是戰時動員與平時重建的協調」，這的確是中肯之論。就我國抗戰以前的情況來說，由於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軍閥和封建殘餘的作祟，將一個國家淪落成次殖民地的形態，說不到軍政的統一，說不到自由的經濟建設，說不到民族精神的培護和發揚。一切的一切都在外鑠與內在的兩重桎梏之下表現凌亂，依賴，灰頹的氣息。可是盧溝橋的炮聲衝破了舊有的沒落的壁壘，揚棄了一切落後的腐敗的渣滓，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就說過：

「自七七以後，全國上下在不變的國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會的風習，政治的氣象，莫不丕然煥發。……民族精神，隨抗戰的發展而燦厲。民族意識，受抗戰的洗鍊而純一，因此而軍政的整飭，軍令的統一，有空前的進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規畫，亦能漸收運用靈敏的實效，且因此而生產的計劃化，企

業的社會化，亦有長足的進步，將來民生主義的經濟基礎實樹立於今日抗戰時期的建設之中。L

這就是說明戰爭摧毀了舊的意識和形態，而新的意識和形態則在戰爭的過程中萌芽和生長起來，怎樣維護這戰爭賜予的新生命而使其發揚光大，這就是復員工作的責任，所以我們的復員決不是復原，而是具有革命性，創造性的復員。

可是，戰爭究竟是破壞性的行動，爲世界正義而戰，爲自己民族的獨立生存而戰，固然可以收穫到前段所說的精神效果，但在物質方面仍不免有重大的損失，一種不是短期間所能恢復的損失。尤其是被侵略的我國，是在國內作戰，敵人的鐵蹄踐踏了大半的河山，幾千萬的人民顛沛流離，無家可歸，幾多重要的資源，若干爭要的工業，以及許多繁榮的農村，都遭受到佔據，劫掠，破壞的厄運。如何從戰火的廢墟上重新來作市鄉的經濟社會事業的建設？怎樣使流亡的民衆與解甲的官兵有家可歸，有業可作？這都是復員工作中的主要目標，所以我們的復員仍是動員，決不是由動而靜的消極的復員，乃

是積極性的建設的復員。

我們的復員特性既如上述，那麼所謂革命性，創造性，以及建設性等就應具有一個共同的標的，作為工作的規範，這個共同的標的是什麼？就是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五十年來國民黨艱真的奮鬥，億萬民衆共同發出的心聲，皆是在企求這一個歷史使命的完成。因此，復員工作與建設工作應該是合拍的，調協的，甚至可以說復員與建國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復員工作的開始就是建國工作的開始；復員工作的完成就是建國工作基礎的完成。

說到建國的工作好像經緯萬端，不知從何着手，但我們只要檢視一下現代國家建國的歷程，定能抽繹出可以覆按的軌跡來。

第一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在歐洲，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十字軍運動開始，就發生了民族內移現象，凡是血統，語言，文化相同的民族開始意識到組織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之必要，到了拿破侖雄霸歐洲，此征彼伐，就以協助各被迫民族恢復自由相號召，

各方聞風響應，民族國家，這一新的形式遂次第的出現，其間雖有先後的不同，外形的各異，但迄十九世紀爲止，這民族國家的本質是非常明確，而統一的基礎却非常的鞏固了。至於我們中國，由於民族性質的比較單純，早具民族國家的雛型，經過秦漢幾個朝代，政治社會制度，已趨劃一；文化的力量，深透各地；血統的混合，鑄合而成功一大宗族，所有這些條件爲歐洲諸國所不及。照理說，這統一的民族國家應該是庸中佼佼，堪爲他國的表率。誰又想得到近百年來，這得風氣之先的中國竟淪落爲帝國主義爪牙下的次殖民地，國內一直是分崩離折，國外則危機重重。此次抗戰的勝利結束，總算是百年來最揚眉吐氣的日子，誰不歡欣鼓舞，快慰於百年的枷鎖解除，國家有了獨立光榮的前途；誰不衷悅誠服，感謝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成功，開五千年歷史中空前的先例。可是竟會有別具懷抱的野心者，不惜將這勝利的光榮作無情的踐踏，使國家殘破，生民塗炭，以遂其從變動中來攫取政權的私圖。因此，這統一的條件仍是鏡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中國是世界的一環，當着其他國家正在比賽着以最集中的力量來跟隨時代改造社



會，謀全民的福利時，而我們的國家還需要痛苦掙扎來完成別人一世紀以前早已經完成的統一，這使我們多麼的慚愧！多麼的惱傷！但統一是一個國家的起碼條件，國民黨能夠創立民國，剷除軍閥，完成抗戰勝利，也一定能夠促成中國的統一，因為這是歷史的使命，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是民主的國家，在歐洲，許多民國家建設的完成，多半是以絕對王權的姿態出現。因為要統一國內的諸侯，反抗有勢力的教權，人民必需以最大的權力賦予其君主。在中國，從秦漢以來，一直是「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專制政體，故也有過統一的民族國家之形式；但無論絕對王權或專制政體，絕不能保障民族國家生存於永久。因為，良君不世出，政治難期清明。同時，工商經濟的發達，民智的提高，絕不認現狀為滿足，必企求一種新的制度來充實建國的內容，使人類更能貢獻其聰明才智以促進社會的向前推移，民主運動於是發生。首先發難的是英國克倫威爾和圓顛黨的「名譽革命」，接着有自始即以民主方式立國的美國獨立，不久就有震撼世界的法國革命

，從此民主潮流風靡世界，莫不傾心，只有深閉固拒的中國仍然是一個老大帝國沒有改變，也沒有會在潮流沖激中求生存，求前途。民國成立，總算有民主國家的招牌，但還沒有民主國家的實際，北伐完成以後，國民政府秉承民權主義的遺教，從事於地方自治的建設，滿翼基礎奠立，民主政治即可順利實現，而國內國外的反動力量，橫加壓迫，以致不能全力從事。抗戰軍興，國土大半淪陷，人民流離失所，自然更不是推行的時機。可是在後方，政府還是在促進民主政治的早日實現，並未因戰爭而有所間斷，或者可說更比戰前尤有事實的表現，如各種民意機關的成立，地方自治的推行等都足以見及一斑。到了現在，由於時代的前進，民主政治又醞釀着新的含義，新的方式，但究其歸趨則適與民權主義所發揮者無形照合。因此，我們確信具有民主政治傳統的國民黨必能完成新型的民主政治，以領導世界的潮流，以滿足全民的企望。

第三是工業化的國家，人類要求生活，就不能不有生產的方法，因生產方法的不同，從而生活就有水準高低的差別。但人類誰不願過不虞匱乏的生活？誰不願有較高生活

水準的享受？於是生產方法的改善和進步，成爲人類迫切的慾求。尤其是現代的國家，動輒以國力來判定國家的強弱，所謂國力，就是國內各個分子經濟能力的總合。而人民經濟生活的提高，就是經濟能力的提高，也就無異於整個國力的加強。在近代經濟史乘中，改變人類生產方法的最大力量，無疑地是從十八世紀中葉瓦特的蒸汽機發明開始，從此，生產方法躍進另一時代，人類的生產能力空前的提高，所有生活各方面的條件亦爲之改觀，因其蔚然成風，影響鉅大，一般史家稱譽爲工業革命。此一革命，先自英國開始，傳染迅速，法國繼之，美國德國又繼之，最後俄國和日本亦急起直追，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其間相距不過一百年，而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大體上都經過工業化的洗禮而完成。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工業革命又有新的形態，一方面有電力機的發明，以及航空的工業之開展；一方面有生產集中與大規模的經營方式出現，生產力達到空前的高度，生活方式亦隨之而日新月異，國父有鑒於此，遂有實業計劃的提出，以爲我國迎頭趕上的藍本，並將這一次的工業新發展，首先名爲「第二工業革命」，可見其影響並

## 不亞於第一次工業革命。

當着世界正向第一工業革命的大道邁進時，我們的國家還是止息在手工業的生產。等到第二工業革命已在世界發榮滋長時，我們的國家還是抱殘守缺的固持不變，就是有一些輕易的輕工業也在整個經濟比重中小得可憐，僅可算爲點綴品。在此種情況之下，人民生活水準的低下，國力的萎縮難振，自在想像之中。爲着豐裕人民生活，充實國家力量，工業化的迅速推行，實在有着迫切的需要。

上述三點，可算替現代國家描繪了一個簡明的輪廓，不，應該說是一幅簡單的素描還更恰當，因爲看了這幅素描，現代國家的概念自會印入眼簾，而會有明確的認識。但是，怎樣將這一幅素描着色渲染成功一張色彩鮮明，奪目動心的偉大藝術作品，那還得需要許多顏料和技巧；明確點說，要完成一個統一，民主，工業化的中國是應該有着正確的途徑和步驟。首先，我們認爲統一是一個國家的起碼條件，要有統一的局面，才能談得到民主政治的施行與工業化的推進；其次，我們認爲民主是國家的必然的形式，要

有民主的政治，才能談得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與生產方式的改進。因此，統一，民主，就是急中之急的先決條件。但要鞏固統一，惟有軍隊即時國家化；要民主能夠不是口號，就立刻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就好像鳥之雙翼，車之雙輪，要有它，鳥才能高飛沖天，車才能運行千里。現在要完成復員建國的工作，並且能夠順利的完成，必須以先完成上列兩者為前提。再比方來說，要以建設國家當作繪製一幅圖案，那麼這兩種前提才是素描的骨幹，即是一些橫的直的粗黑的線條，有了這些線條，黑筆落在白紙上，這幅圖畫的徵象才算成立。但是，單只素描，究竟不是一幅堂皇的圖畫，必須以上着色彩來充實它的內容。因此，經濟的安定與新生，交通的維護與發展，教育的改進與普及，衛生的革新與擴展，就是充實內容的材料，也就是我們復員建國工作的重點所在，沒有它，這幅畫就要暗淡無光，而不會形態栩栩，耀人心目，也即是說，這四項若不能做好，那麼我們的國家仍然是貧弱無知，不能生存於現代國家之林。

這兩項前提與四項重點合起來，就是目前復員建國中的六項急務，這六項急務的完

成，亦即是復員建國工作的完成。

但是，所請兩個前提，四項重點只是達到某一種特定目的的手段，並不能代表我們的理想，這即是說，我們要建國，到底以甚麼理想作根據？譬如以政治民主化來說，好像它已經是目的，其實，深究起來，民主政治的內涵不同，方式亦各異，我們要怎樣一種民主政治，要用什麼一種方式來實行，這當中就有無窮的差別，民主只不過是一個共通的手段。這從民主政治演變的歷程來觀察，來考驗，就可獲得充分的證明。由此說來，我們的理想和目的究竟是什麼？縱觀世界近代思想的來龍去脈，體認半世紀來事實的反證，我們可以十足肯定地宣揚：三民主義確是最前進長革命的思想結晶，如何迅速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理想和目的，所有一切的設施，所有一切的行動都應該以它為最高的準繩。

## 二 軍隊國家化

國家要能獨立生存於世界，必需擁有不可侮的國防力量，國防力量的具體表現，就是軍隊。所以軍隊的成立，完全是應付國防的需要，担任捍衛國家的主要任務。因此，就軍隊成立的本質來說，根本不會有國家化的問題發生。在專制時代，軍隊是受君主的指揮節制，而君主是國家的元首，他的身份是代表國家，所以軍隊仍然是國有的。進到民主時代，軍隊的國有更成爲不容也不應該置議的問題，因爲民主國家的政府是代表人民意志，維護人民權利的工具，政府能控制軍隊自然是天經地義的條件，如英、美等國在平時，常備兵額非常之少，一旦發生對外戰爭，才從事召集，可見軍隊完全是屬於衛國的武力，並沒有旁的任務也要軍隊來爭鬥，來從事。就是政府的更迭，也純是政黨用口誅筆伐作爲競爭的工具而取得政權，決不是用軍隊的武力來奪。所以，軍隊的存在，無論在專制政體或民主政體，決不會有國家化問題。假使有了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國家

正處於動亂的時代，如唐宋時藩鎮的擁兵割據，那就是國家崩潰的先兆。至於佔據山頭，殺人越貨之流則無時無之，如唐時的黃巢，明末的李闖，張獻忠等，雖然他們也裹脅若干的人衆，足與政府相對抗，甚至推倒政府而有餘力，但是，他們的這種武力完全是爲發展一己野心私慾的武力，根本不能稱爲軍隊。假若他們都得算爲軍隊而可以算爲國家一部份政權所寄，那麼，就是現代民主先進的國家內隨時都有成羣結隊的暴徒，他們也可算爲軍隊，以至也會發生軍隊國家化問題了。

中國自國民黨推翻五千餘年的專制政體成立民國以來，照說國家應該順利地走上民主的坦途。可是，最初就有各地的軍閥擁兵自大，互爭地盤，馴致兵禍連年，國將不國。這就當時主持政府的人物以及所有的措施來看，人物無不是軍閥後身，行爲無不殃民自利，國家的動亂自在意想之中。北伐成功，各地軍閥相繼削平，國家統一眼看完成，而共產黨乘機起事，但當時的國民政府是有深厚的革命歷史，一手創立民國，爲大多數民衆所矚望，所擁戴的政府，爲着維持全國的安甯秩序，爲着建國事業的完成，安內的



工作，實在是萬分的必要。殊不知安內尚未告竣，就發生史無前例的七七抗戰，但，截至此時止，國家並無統一與否的問題，更說不上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因為當時的情況只是戡亂，除暴，而不足以言協商，統編。

抗戰軍興。全國上下受國民黨抗戰國策及領導精神之感召，靡不忠義奮發，誓為國用，共產黨也就鄭重的宣言：

「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取消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的職任。」

由這一篇宣言的含義來說，當時的共產黨果真能始終如一誠意實行，倒不失為一個良好政黨初次出現的楷模。但是抗戰八年來經過的情形何如呢？事實具在，明眼人自然能夠一目了然，不用再為詳說。可是在國民黨方面本其一貫的統一禦侮政策，忍辱負重，對於願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取消暴動政策，還武力於國的共產黨，自然表示衷誠的容納

，共赴國難。從而共產黨好像無形中取得合法政黨地位，但又不遵守一個合法政黨獲取政權的正當途徑。却趁着抗戰的時期，擴充實力，伸張地盤，前面所提的諾言則棄諸腦後。國民黨以國家民族的生存爲重，不願在強敵未摧，存亡日夕的時間來斤斤計較，共產黨的勢力遂致坐大。到了抗戰勝利結束，復員建國萬端待舉的時候，國內又發生攘奪接收，破壞交通，甚至於攻城略地的現象。國民黨以和平建國爲宗旨，值茲大城結束，人民亟待休養生息的際會，決不願再事干戈，一切均以寬大容忍處之，蔣主席在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開幕時致詞道：

「我們以貧弱的國家，進行了八年餘長期的抗戰，而且在抗戰中間還存在着變亂分裂的危機與擾攘紛爭的因素，所以我們由戰時渡到平時，要進行復員建國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難與阻力，特別繁多。這些困難與阻力，我始終認爲唯有以最大忍耐來克服，以大公至誠的精神來消除，也要秉着我們歷屆決議「政治問題用政治解決」的方針來處理。因爲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救國與建國，抗戰結束以後，建

國的成敗，爲國家存亡之所關，而建設之先決條件爲統一與和平。抗戰八年餘之久，殘破犧牲，不可數計，人民流離痛苦，渴望還鄉樂業，所以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也在於和平與安定。我們在抗戰結束以後種種擾攘紛爭的現象不堪重溯，但是我們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志願因種種的疑難阻礙而沒有實現。我們和平建國的國策，由於全國未能達到精誠團結與真正統一，而無法順利進行。但是我們認爲必須解決的困難，也在革命建國的本黨無可旁貸的責任。由於上述局勢的分析，各位同志就可明瞭我們這九個月中間一貫以政治方法解決紛爭，以商談方式停止軍事衝突，以及召集協商會義的由來，我們爲了要實踐召開國民大會及早實施憲政的宏願，爲了愛惜戰後國力民力的凋殘，爲了促成國內進一步的團結，所以我們一方面承認各黨派的合法此位，一方面邀集各黨派人士與無黨派之社會賢達舉行了三星期的政治協商會議，對軍隊國家化及政治民主化問題，與各方面相協商。

由這一段坦白誠懇的言詞中，很可領會到政府是在怎樣一種忍讓爲國的偉大胸襟中來求

和平建國的完成，各黨派的人士，假若真有爲國爲民的忠誠，應該有所感動而共同奮勉來担任建國的大業。

因爲各黨派取得合法地位的諾言，才有用政治方式來舉行協商，以期精誠團結，共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又因爲共產黨曾宣佈爲三民主義而努力，以所有軍隊交與政府統轄節制，國民黨爲着表示一本大公的精神也將政府的軍隊一併整編，這就是軍隊國家化問題的由來。但是，按法理來說，國民政府是國民所擁戴，全世界所公認的合法政府，它所統轄指揮的軍隊，就是國家的軍隊，除此而外的武力，就不能同時並存。至於國民黨是五十餘年來創建民國的執政黨，政府既是由它所主持，軍隊間接也應受其指揮，抗戰八年終獲勝利，就是國民黨在其不變的國策下督飭政府，指揮軍隊所收獲的光榮成果。難道我們可以說，這些血戰八年，勞苦功高的將士也全是爲國民黨而效力，並非爲國家爲民族而流血流汗嗎？這與剛才對於政府的軍隊就是國家的軍隊之論證一樣，可以說明國軍就是國軍並非黨軍。但反觀共產黨，則始終不遵守諾言，對於自己的武力，

只圖擴張，雖一度曾有國軍的番號，但從未履行接受軍令政令的指揮。所以，它這種武力，只是私的武力。假若硬要自說是黨軍，就要問它的根據和理由何在？因為一個堂堂正正的政黨斷非自己可擁有武力處處與政府站着敵對的地位；同時，斷不能爲着政權的攫取就自爲刀俎，而不惜以人民爲魚肉。但是，國民黨爲着和平建國的早日完成，爲着表現現有的軍隊並非一黨的武力起見，也願將所有的軍隊與共產黨武力的共同編和統編來達到軍隊的國家化，以期共產黨疑慮消失，國家可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

經過三星期的政治協商，訂出「和平建國綱領」，作爲今後全國一致努力遵循的準則，關於軍事方面，在第四項軍事綱領中，有明確的規定，該項綱領共六則，第一規就揭發出，「軍隊屬於國家，軍人責任在衛國愛民，確保軍隊編制之統一與軍令之統一」，由於這一原則的確定，軍隊的性質任務和規律都有所表明。但如何達到此目的，勢必還需要補充與註明，因而該綱領第二則就規定：「軍隊建制應適合國防需要，依民主政制與國情改革軍制，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改進軍事教育，充實裝備，健全人事經

理制度，以建設現代化之國軍。」

爲着將上面兩項軍隊國家化的原則，由抽象而見諸實際，軍事三人會議費了一月的時間，經過六次會議，而完成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爲國軍之基本方案」。該方案共八條，所有有關軍事的各方面都有簡明的規定，尤其是復員及統編兩項更有確定的時間與數字的限制，配置方面亦有硬性的註明，茲將此三項摘要臚列於左：

復員方面——在協定公佈後十二個月內（本年三月起至明年二月底止），政府共保留九十個師並立即將九十師以外之各部隊復員，中共共保留十八個師，並立即將十八師以外之各部隊復員，在上述十二個月之時期完畢後之六個月內，政府軍應更縮編爲五十師，中共軍應縮編爲十師，合計六十師，編爲二十軍。

統編方面——在本協定公布後之十二個月內，應編成四個集團軍，每集團軍包括政府軍一個軍，中共軍一個軍，每軍三師，在十二個月以後之六個月內

，應將上述之四個集團軍改編為獨立之六個軍，內中四個軍各包括政府軍一個師，中共軍兩個師，兩個軍各包括政府兩個師，中共軍一個師，以後集團軍應即取消。

配置方面——在十二個月終了後，各軍之配置應如下：東北，六個軍，政府五軍，中共一軍。西北，五個軍，全屬政府軍。華北，十一個軍（內包括統編四個集團軍），政府七軍，中共四軍。華中，十個軍，政府九個軍，中共一個軍。華南（包括台灣），四個軍，全屬政府軍。（關於人事及十八個月終了後，尙有之新配置未加列載）。

整軍方案能有這樣確切的規定，當然是經過互相的同意與考量。一經簽定和公佈，自然就要按步的實踐。回想當此方案簽定之日，誰不歡欣鼓舞，認為十八年的糾紛可以一筆勾銷，今後不會再有以武力作政爭工具的政黨出現，而和平建設的新時代轉瞬來臨，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將在渴望中實現。可是方案的墨藩方乾，鄭重的諾許還言猶在耳，

而中國生命線之東北竟發生掀天的浪潮，共產黨的武力在國人明知却不能揭穿的掩護下，源源進入東北，如火燎原，如水氾濫的伸張擴展，整個的東北，好像都在席捲之中。它所引起的陰霾遮蔽了澈天的光明，暴風雨的降臨迫在眉睫，從而所有憧憬着的統一與民主，以及全國目光所投射着的整軍方案之實施，就在大家關心于東北的情況中而沖淡，而轉移。這就是鼓動新事件，掩蓋舊諾言的一貫陰謀。等到東北問題明朗，又製造華中的衝突；華中的烽火未熄，又串演蘇北的攻城戰，所有這些動作無不是在造成恐怖局面，撩亂全國人的耳目，混淆是非，泯滅公論，作為不履行協定的煙霧和借口。但事實總是事實，誰能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是非自有公論，誰能顛倒黑白，敗壞所有的良心。我們只要檢視政府方面對於復員整編等的措施，就可作為勝于雄辯的反證。

本年三月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時軍政部長陳誠氏有一篇軍事復員報告，由這一報告我們可以瞭然政府軍事情形及將來的動向。關於軍隊的數量方面，由于政府整編軍隊的結果，截至三十四年底止，裁減三十六個軍，一百零九個師，二十一個旅，約佔全



體數量三分之一。關於復員方面，曾標明常備兵力的保持，應依據國防需要，並衡量國家財力物力，儘可能縮減至最小限度，規定全部復員時期爲十八個月：第一期十二個月將國軍步兵八十九個軍，二百四十二個師復員爲三十個軍，九十個師，第二期六個月將國軍步兵由九十師復員爲五十個師。關於官兵生計方面，因第一期復員之軍官佐屬約十八萬人，士兵約一百二十五萬人，第二期再度復員之軍官佐屬約五萬人，士兵約六十萬人，數目相當龐大，故不能不作有計劃之安置，且因我國正從事建設之主要關頭，需要的人力極鉅，同時抗戰八年來農村凋敝，廬舍爲墟，多數官兵雖解甲而無田可歸，針對此兩種原因，遂在第一期安置計劃中規定深造，退役，專業訓練，及個別轉業與集團轉業等方法，以期生活無虞，人得其所，國得其用。

我們從上面所摘錄的軍事報告中的幾個項目，就可得出兩點明確的認識和結論：

第一，就目前我國的國防力量來說，裁軍並非絕對的必要；但政府爲着表達和平建國的決心，就以裁軍作爲事實的鐵證。現在我們看政府的裁軍，已見諸事實，將來的繼

續裁減，也必見諸事實，因為所有復員官兵的生計和安置，業經有計劃的決定，分別付諸實施。這就是有力的說明，政府並無而且始終就無用軍隊作為鞏固政權的存心，更談不到用來作為剷除異己的工具，要不然，多多益善，為甚麼將二十幾萬的幹部，將近二百萬的大兵分別的復員而使其脫離軍旅生活？

第二，政府對於整軍方案的信守不渝，完全是為國家民族的耿耿忠心所使然，我們由復員方面的兵額數字上就可獲得足夠的說明，這就是說政府用誠意來表現事實，以期對方憬悟，而共同完成軍隊國家化的當前急務。

可是共產黨方面的反映，則適得其反。一方面是擴張武力，凡經過之地成年壯丁都裹脅而去，以至現存的武力比抗戰期間不知增漲若干倍；一方面是用暴動政策，破壞農村，使人民流離無所，生活無着，而達到共同暴動的動員目的。假若將兩方面的動態來對比，很可以得出鮮明的對照，一是裁軍，減少武力，一是擴軍，增加武力；一是復員從事建設，一是動員從事破壞。究竟誰是阻撓和平統一中國的完成，當可洞若燃犀，不

用再論。

但是政府方面既然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口號，並簽定了三人軍事小組的整軍基本方案，自然要以身作则先行按步實施。在本年六月三日國民政府紀念週上，新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氏，曾將戰後我國軍隊的整編與復員，軍事機構的改組等作概括的報告，關於整編方面，除了遵守整編基本方案規定的數量及配置外，並分別訂出步驟及期限，俾能按時完成，關於軍事機構調整方面，曾指出是為還軍於國，原報告有云：

「還軍於國，乃本黨之一貫政策，此次成立國防部，即為貫徹此種政策，我國今後將實行民主立憲，更不可使軍事機構再脫離行政系統而獨立。」

我們知道在訓政時期是以黨治國，是用政治的力量訓練民衆使其能夠真正的領悟四權，以及如何使用四權，而其終極的目的，還是在實施憲政。憲政開始，政權交還於民，服屬於政權的軍隊自然也隨之轉移。國民黨是以實施憲政為目的，故還軍於國也是一貫的目的。現在各黨派既然取得合法地位，民主政治的實行即將開端，自應貫徹還軍於

國的願望，這與前面所述，政治協商後，始有軍隊國家化之問題提出，同具一理。由於要還軍於國，使軍隊官兵的服役，退役，除役有良好的規模起見，所以在關於軍事復員方面，作了詳細縝密的計劃，不僅有良好的方法，並且釐定期限，按期實施。

總之，如何實行軍隊國家化的工作，政府已在各方面有事實的表現，只要共產黨也能夠誠心合作，按照協定，以事實作證明，那麼這復員建國工作的最大前提，當能一氣呵成，蔚成盛舉。統一，民主，和平的新中國，就會不是憧憬中的遠景，而成爲計日可期的樂園。

### 三 政治民主化

民主政治是中國應時的良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全國不分階層，不論派別所一致提出的口號，但是，大家要明瞭，民主政治不是可以一蹴而成，並非張口漫叫就可實現，記得有一位外國人說過民主政治不是出口貨，這自然是不免誇大民主政治的區域性。可是我們由他這句話也可反省到國情的不同，民主政治的施行容有相當的困難，這一事實的存在。不過，所謂困難並非不能夠施行民主政治的困難，而是如何克服民主政治的障礙以及培植民主政治的條件之困難。國民黨革命奮鬥的五十餘年，就是在克服這種困難，培植這種條件的過程中消逝。而它的有黨以來終極的目的，是實現民主政治，這無論從國民黨所崇奉的主義上，政綱上，以及歷年以來所表現的事實上，均可得到有力的證明。

先就主義方面來說，三民主義的精義，固然與目前歐美流行的民主政治不盡相同，

但民主的本質則大體相通，或者可以說只有過之無不及。因為民權主義就是主張建立政治的民主，民生主義就是主張建立經濟的民主，民族主義就是主張建立國際的民主，可見三民主義主張的民主比現在歐美流行的民主政治的民主更來得進步和澈底。次就政變來說，建國大綱內曾將建設的程序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在掃除憲政的障礙；訓政時期在培植憲政基礎；憲政時期在實施民權政治。時間上雖有段落分別，而其目的則一，因為軍政與訓政不過是達到憲政的手段，換句話說，軍政時期是國民黨的同志用血來灌溉憲政，訓政時期是國民黨的同志用汗來助成憲政，所有的血和汗無不是在求憲政這一碩果的獲得，從而我們可以說，民主政治的實行是國民黨革命以來早已具有的目的，好笑的許多自詡爲民主政治的提倡者竟認爲民主政治是由他們所提倡，所努力，這真是有如象養遼東白豕者的未開識面，所以只認爲自己的好，而不知其他地方的更多更好。

單是理論上的表揚，說不定許多慣於攻訐的人會說是招牌，是空論，現在我們就將

國民黨的前期革命歷史中，許多主張實施民主政治之史實，隨便檢幾樁出來，以塞一些疑忌毀謗者的口。

### 甲、同盟會時期

在民國紀元前八年，中國同盟會爲揭櫫宗旨，團結同志，曾發表宣言道：

「本會主義，於民族之後，加以民權民生，三者之中，限於時勢，差有緩急；而所以繕美羣治之道，則初無輕重大小之別，遺其一則俱敝，舉其偏則兩乖。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前者爲之始端，後者其究竟也。」

可見在彼時，同盟會即以實施民主政治爲努力的主要目的。而長時，清廷未屋，反革命的封建勢力窒礙重重，民族革命的成功尙未可卜，但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卽有下以民族革命爲止境的主張，確認實施民權主義爲革命的最後日進之一，就當時的環境言，能不

謂之空谷足音，能不說是難能可貴！

## 乙、光復時期

民國元年，國民黨組織成立，在宣言中，曾解釋國民黨三字的意義，並明示其宗旨道：

「共和之制，國民爲國主體，吾人於使人不忘其義也，故顏其名曰國民黨。黨有宗旨，所以定衆志，吾黨以求完成共和立憲政治爲志者也，故明其義曰：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

僅就國民黨的黨名而言，已標明民主革命團體的含義，自不用說實施民主政治當爲國民黨所固持的宗旨。但近年來竟有以民主爲招牌的團體，認爲冠以民主二字，就可表示能夠實施民主者，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其實，這只是所謂東施效顰，不辨妍醜的表現。



### 丙、討袁時期

民國五年 國父於討袁第二次宣言中，曾說道：

「文自束髮受書，知憂國家，抱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終始不替，所與避者，亦類爲守死善道之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達，乃袁氏推翻民國，以一姓之尊而蔑視五族，此所以認爲公敵，義不反顧，若夫今後敷施之方，則當共事者，所宜一切根據正確之民意，乃克有濟。」

尊重民意，就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但尊重的民意是正確的民意，而並非偽造的，自私的民意。假若尊重偽造的民意，或自私的民意，那就是暴民政治或害民政治。現在就有許多偽造民意，混淆黑白的現象出現，而探溯其原，無非是在遂其野心，達其私慾。政府不從，則以漠視民意爲借口，肆意攻訐，以民主主義者自居。殊不知其自身就是民主政治的蠹賊，暴民政治的前趨者。

## 丁、北伐時期

民國十三年 國父北上曾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爲解決時局的主體，不幸宏願未成而中道崩殂，然臨終遺囑猶復諄諄叮嚀，務須於最短期間，召開國民會議，可見他主張民治的精誠，至死亦不稍減。

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實施憲政的障礙掃除，亟待訓練國民，逐漸行使四權，以立憲政基礎，遂於十七年十月制定訓政綱領，引言中就說道：

「中國國民黨實行 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  
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治。」

上面所述的幾個時期，都還是國民黨一直在風雨飄搖中，未獲根基穩固的時期，但是實現全民政治仍是一貫的要求，不避萬難，不計艱辛的力求早日實現。如有阻撓，或其本身存在就足以成爲實施憲政的障礙者，必盡其全力摧陷廓清，掃出前進的康莊大道

●早期的推翻滿清，剷除軍閥，其目的在此；而最近八年來的艱苦抗戰，終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目的亦莫不在此。

假若認為許多歷史上的主張，還不足以表達國民黨實施民主政治的決心，那麼我們可以再簡單的檢討一下，最近十餘年來所有的行動和事實，作為進一步的鐵證。

### 甲、關於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為國民黨還政於民的前奏，也是民主政治實行的序幕，這是全國共同確認的信念，同時也是許多民主先進的國家所必經的階段。因此，國民大會的召開實在是有時代的使命。國民黨為求貫徹實施憲政的初衷，十餘年來都在為着它而努力，從二十一年十二月四屆三中全會擬定二十四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後，關於籌備事項就積極付諸行動。二十四年十二月五屆一中全會時就決議：二十五年五月五日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應於十月十日以前辦竣。嗣因全國幅員過大，各地代表的選舉，未能一律依限完成，遂由二十六年二月五屆三中全會決議：督促該管機關，繼續辦理選舉，於二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不意日本帝國主義即於七月大舉進犯，阻撓我憲政的進展，從此，國家就進入為民族爭生存的戰爭時期，一切均應以戰爭勝利為第一。但國民黨認為對日之戰，不僅是本國的民族生存戰，而是世界性的爭取民主戰，故一方面除從事於抗戰的動員外，一方面更從事於建國的動員，期將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齊頭並進，俾能內求國家之獨立，民主，外能迎合世界之潮流。從而，對於實施憲政的意志和行動，並未因戰時而影響，或中輟，反而是，百折不撓，歷久彌堅。二十八年十一月五屆六中全會時，就毅然決定，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為國民大會開會日期，這一偉大，果敢的決定，真可以振奮人心，震懾敵胆，不幸因戰局影響阻滯，致各地交通，大會之召開實為事實所不容許，當經多數參政員的要求，展期至戰後再行召集，然政府僅允放慮，並未曲從，所有選舉事項仍由專管機關積極辦理，會場建築事宜特設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主持。三十年四月五屆八中全會始表明因事實上之困難，選舉未能如期辦竣，國民大會的召集亦不得不延期，而同年八月敵機竟集轟炸在重慶復興關建築的，可算為中

國民民主搖籃的國民大會場，使此負有時代使命的建築全部化為灰燼，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領導中國實施憲政的妒視和畏怯，由此可得一最好的證明。迨太平洋戰爭爆發，國內交通益形困難，大會的籌備，更受影響，嗣後，日寇進攻愈亟，戰爭日趨緊張，國民大會的召開實非特殊環境下所許可，去歲抗戰勝利結束，遂決定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而本年來國內政爭紛紜未已，遂又改定本於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決不延期。由上面所述國民黨在戰前戰時，以及戰後，對國民大會召開的努力經過，就可推想到它對於實施憲政的決心如何的堅定，其對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又是何等的迫切。

## 乙、關於憲法草案

民主政治的精神寄託法治主義，而法治主義的理想則附麗於一部憲法之中，所以憲法的製訂，就是民主政治的開端；憲法的實行，就是民主政治的開始。不過，嚴格說來，所謂憲法只是一種共同的思想的具體結晶，只是代表一個體的思想，由它來付諸實現的工具。當個人自由主義風靡一世的時候，英國的「大憲章」，成爲英國憲法的經典

；美國的獨立宣言，成爲美國憲法的基石；而法國的「人權宣言」，自然成爲法國憲法中的靈魂。但由於思想不斷的前進，以及各個國家國情的分歧，憲法就非一成不變之物，所以「Constitution is Growing」這句話是現代憲法中的通則，就是由於民族，文化，歷史不斷的演變，憲法不得不適應的起着推陳出新的作用。如法國憲法改了十二次之多，威瑪憲法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有許多的調整，蘇聯憲法也有過去與現在的不同，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不啻給一些專門仿效，崇拜外貨的人一個當頭棒喝。因此，中國沒有憲法則已，要有憲法一定以三民主義的精神爲依歸，這無論從學理，從事實，從世界潮流，從國內實情來看，它都可算得我國國魂所寄的大義，憲政所基的準則，要怎樣將這大義，這準則在憲法中來切實的表現以至於實行，這是國民黨的歷史使命，更是全體國民最光榮的任務。

實施憲政既是國民黨一貫的目的，三民主義既是制定憲法的最高準繩，那麼所存在的只是制定憲法的技術問題，現在我們就來簡略的檢討一下草憲的經過。

以往有許多人認爲國民黨故意拖長訓政時期以便不實踐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諾言，這種說法起碼犯了不認識訓政時期的意義及其使命，前面已說過，訓政時期是在爲憲政打基礎，在訓政綱領第三條中就標明道：

「依照 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

可見要實施憲政，訓政時期這一階段萬不可少，但國民黨並沒有將這兩個時期的界限劃分得十分嚴格，不能有所踰越；相反的，認爲這兩個時期是可以融合的，並存不悖的，這就是說，爲了早日實施憲政，不一定等待訓政時期的完成；爲了憲政的實施順利的，不妨在憲政時期仍從事訓政工作，蔣主席在「促成憲政與實施訓政」中就有透澈的說明：

「我個人的想見，以爲促成憲政和實施訓政，不但不相妨害，而且是相需相成，我以爲訓政工作不僅在訓政時期要積極進行，而憲政不一定要訓政完全結束之日才

開始，這是從總理遺教的精神中間大家都體會得出來的，換言之，早日實施憲政，正是我們革命的目的，並不是違反本黨的政策，同時，也唯有真正努力於訓練人民的工作，才足以確實奠立我們的憲政的基礎。⌋

由於訓政時期在爲憲政打基礎，訓政時期也可實施憲政的闡明，前面所述的誤解觀念，不改自破，同時，就以往訓政的情形來說，所有一切的措施完全根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而行使，這個約法，照手續來說，它是經過國民會議的通過；照內容說，人民權利義務均有所規定，所以它是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是不容否認的。由此可見，就是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也一本法治的精神作憲政的嘗試。

訓政時期約法固然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但究竟是臨時的，過渡的，而非永久的，完善的根本大法。因此，國民黨在二十一年的四屆三中全會時就決議，由立法院速起草憲法頒佈之，以備國民之研討。自此而後，就經立法院不次的起草研究，並經四屆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的審議，於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由國民政府公佈，定名爲「中



華民國憲法草案」，一般簡稱爲「五五憲草」。

「五五憲草」公佈的翌年，抗戰發生，國民大會擱淺，從而制定的階段不能實現，但爲求集思廣益並標明早日成立憲法的決心起見，遂有五屆十一中全會於戰事結束一年內公佈憲法的決議，以及黨政機關，民意機關根據此項決議而發動的憲草研究運動。一時風起雲湧，對於憲法的內容都有不少的批評與貢獻，政府皆一一收集，彙成意見，將來提出國民大會作參考。

就這簡短的敘述來看，國民黨對於民主政治的柱石之憲法是早有草成的決心與盡量公開，博採民意的願望，還能說國民黨不願實行民主？

### 丙、關於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發源於歐洲，盛行於美國，瑞士。在我國歷史上雖有地方自治類似的組織，但無地方自治之名。如最早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及歷代的社倉社學，降至前清的鄉保牌甲等皆是。不過，就本質說來，所有歷代的組織都是在君主

政體之下，由於官方命令推行的便利而成立，並非由於爲着養成人民有當國家主人的習慣和能力而組織。因此，它的制度，既不完全，性質完形無異，如閩里保甲的組織，就是在代官層層使役，防盜的性質蓋過於政治的性質。再說，如社會科學等也只是屬於慈善的立場，而不能使保甲的組織形成一個團體。故實行的說，以往的地方自治並不能算爲地方自治。

保甲制之對甲之規定，所謂完全自治的組織，應該以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刑罰機關要着，軍隊修築成立，人民教育普及，使自治的實行，而完畢其國民的義務，並實行革命軍人義務，所有這些事項都去顯給清楚，在理論上始「保民理民教養兼施」，性質上始「不使受受於刑罰，而且爲經濟組織」；在事實上，「地方自治爲實行三民主義之基礎」，「使後者爲」爲政治上最高指導原則。所以爲着三民主義的實行，時髦點說，爲着三民主義的實現，地方自治的推行有着至高的決定性，對於地方自治的努力也可說非爲民主政治的實現而努力。

國民黨從十六年推倒軍閥起，就是在不斷的促進地方自治的推行，在法令方面最早，最顯著的有十八年三月三十大會通過的「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之基礎案」；二十年十一月三屆二次臨全會決議的「推進地方自治案」。嗣後歷次的會議對於地方自治皆有詳盡的檢討並力促實現的決議。在事實方面，如新縣制的施行，以及各級民意機關的成立，皆是完成地方自治的前奏，近年來後方各省中對於區保長的民選也在漸次實行，更是民主精神日在孕育發展中的表現。

無可否認十幾年來地方自治的推行不夠預期的程度，而所表現的事實也有使人不滿意和詬病的地方。但是我們要知道一種制度的實施，是要在不斷的試驗過程中求改進，在不斷的改進中求進步到理想的階段。譬如民主政治在歐美可算得根植深厚，但在最初實行的時期也是破綻甚多，單是選舉一項在各國也就有不少越乎常軌，在中國人眼光中認為是非法選舉的行動存在。就是到最近，民主政治在與民衆打成一片方面也還是爲人所不滿。如前面曾引到的「和平之條件」的作者卡爾就說過：

「一個平常的選民，也不如往前那樣易於感到，自身是生活在一個治人而又治於人的制度之下，這個治者與被治者同爲一體的說法」也是民主政治之所以異於獨裁政治的假設標準之一——不免成了空談。因爲政府的事務日趨繁雜，匹夫匹婦不但不能插足，抑且不能領會。有產者會藉以珍視政治權利爲統治階級的特權與工具的舊民主政治業已死去，而企圖使民衆意識身爲統治階級的權利與義務的新民主政治尙未產生。」

可見在英國有三百餘年，在美國也有一百數十年的民主制度到現今還有可講議的危機和事實存在。而我國的地方自治的開始推進，雖說有二十餘年的歷史，但中間由於對內剷除軍閥，對外與日本帝國主義抗戰，花費了不少的歲月，真正實行的時間究極有限。就情理上說，我們何能求全責備的肆意抨擊，何況事實上在抗戰期間後方各省的地方自治情形也有不少的好成績表現，我們怎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以一二憾事來抹殺全盤的功績。更就理想方面看來，我們這種以三民主義爲靈魂的地方自治，正是使民衆意識

身為統治階級的權利與義務的新民主政治的階梯，惟有它的實現才是政府與民衆打成一片的實現。我們更何能因階級食而不加以維護和發展，而半途就予無情理的摧殘。俗語說：「前人種果後人收」，這就是說明前人的辛苦往往不是後人所理會得到的，但對於成果則後人却有很好的享受。二十餘年來國民黨對於地方自治的努力正好像種果一樣。已將條枝連帶地下一番心力，在不久的將來就有碩壯的果實可以採擷，可是目前還在空虛的談話，正像空談的權說，與共同的培養，而許多沒有種植經驗的人，既未參加耕手既足的生活，自然不知道這收穫的艱辛可貴，又何能不妄想今日開花，明日就結果呢。

由上面三受所論述的行動和事實來說，國民黨實施民主政治的決心可以說昭如日月，今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定能夠領導而趨於完美的境地，目前就要各黨派認清現實，捐棄小我的成見，共同向一個目標前進，使政治民主化早日的完成。

目標既同，而又不是只口喊民主，以民主爲招牌，遂達其一己的私慾，那麼前面所

述的三項，就是眼前的急務；因為惟有國民大會早日開會；才能制定民主政治的基石之憲法；惟有憲法的早日制定，才能實現政治的民主化；惟有地方自治的基礎穩固，才能執行憲法，完成民主政治的使命。

## 四 經濟的安定與新生

經濟的安定是將動盪的經濟浪潮納入平靜的軌範；經濟的新生是要將整的經濟形態導入光明的歸趨。就程度上來區分，好像前者屬於消極性的工作，後者好像屬於積極性的工作。就性質上來判別，好像前者屬於復員工作的範疇，後者屬於建國工作的範疇。其實，合攏起來，作一個深刻的探討，兩者仍是二而一，而表面上成爲一而二罷了。因爲經濟組織就是有生命的有機體，這就是說，經濟的各部門是聲息相通，互相依存的；經濟的形態是後浪催前浪，層層相因的。前者是橫剖面的相關性，後者是縱剖面的相續性，縱橫的交織構成經濟的實質和動態。因此經濟的措施無論加于任何一個部門，或採取任何一個行動，都會發生不可分的影響，這即是說消極性的工作中就不得不含有積極性的工作成份。再就復員建國的本身來說，二者的目的與手段是統一的，有關連性的。

從而經濟的工作就應該是整體的，而沒有何者去復員，何者是建國的區別。由於這一論點的闡明，我們對於目前的經濟現象先要有縱的歷史上的分析，以求得問題的本質，才能有解決問題的對策；要對於經濟的各部門有全盤的觀察，以獲得問題的實際，才能有展開工作的對象。

現在擺列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經濟危機的險景，置身於中的人感到生命的岌岌可危，從旁觀察的人也覺得觸目驚心，恐受殃及。因此景中人在作最後的掙扎，而旁觀者也在作逃避的打算，悲觀的成份籠罩着整個的社會，好像面臨着大崩潰的前夕，一切的措施將成爲徒勞。不錯，經濟危機的浪潮，洶湧澎湃，惶目惕心，身在浪潮中者自然掙扎維艱，身在岸上者也有波及的危險。可是人類究竟是能克服環境的動物，歷史上洪水滔天的情形究不多見，因爲有了築隄浚河的方法；而臨着汪洋的大水並不可怖，因爲有了代步的舟楫而可以遠涉重洋。所以經濟的危機存在是事實，但能夠克服和渡過也不見得不可能。假若我們能夠祛除這種心理上的悲觀因素，用清醒的頭腦來作理智的觀察，我們



就可明晰目前經濟危機出現的來龍去脈，而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和由認識而派生的解決方法，由解決方法而產生前途光明的信念。

中國的經濟形態一直是保持着次殖民地式的典型，沿海都市由於交通的便利，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容易發榮滋長，於是現代工業漸次萌芽，金融組織亦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以致造成沿海都市的假繁榮，而無形中操持着中國經濟的命脈。但在農村方面則封建殘餘勢力還是支配着整個的生產關係，農民始終受着過重的佃租制度的壓榨，同時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透過了工業而侵入農村，導引了工業品價高，農業原料價低的剪刀式之恐慌出現，農民無形中就受到另一層經濟的剝削。農民的耕地比例，在世界各國中說來已經小得可憐，生產的收穫本來已不夠上享下畜之需，再加上雙重的壓迫，自然惟有在飢餓線上掙扎，再說商業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獨佔性，使所有的商業資本都轉化為買辦資本，成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橋梁，在這種畸形的經濟形態之下，整個的國民經濟四分五裂，無整個組織和體系之可言；經濟形態遂時在恐慌的邊緣中漫

抗戰軍興，形勢爲之不變，因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藩籬盡去，經濟危機的外鑠因案解除，經濟的本質方面遂有新生之機。可是由於沿江沿海的都市先行喪失，等於工業中心與金融樞紐的喪失，經濟的困難，馬上展現出來。至於農村方面，雖說代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工業品退出了農村，不等價的交換剝除，可是由於官僚資本與商業資本，土地資本的結合，農民並未因農產品的高漲而獲得農村的繁榮。茲爲瞭解上有具體的概念起用，實有將八年來後方的經濟情形作一鳥瞰的必要。

先就工業方面來說，在戰前中國少數的民族工業原都是集中在沿海都市一帶，抗戰爆發，一部份工廠開始「內遷運動」，數目達六百餘家之多，但與仍留在淪陷區的工廠比較還是瞠乎其後。可是由於內遷工廠的分佈各地，無形中給後方一個近代工業的精神榜樣，從而後方的工廠也就在萬難的條件下林林總總的成立起來。依據三十三年底止經濟部登記工廠的總計數字，全後方共有工廠五，二六六家，資本四，八〇一，二四五千

元，工人三五九，六六三人，這與戰前全國登記的工廠統計數字比較起來，實有莫大的差異，那時全國的工廠有三，九三五家，以後稱爲後方區域的工廠僅有二三七家，佔全國工廠的百分之六，〇三；全國的工業資本總額有三七三，三五九千元，而後方區域的資本僅有二五，二三四千元，佔百分之四，〇四；全國的工人總數爲四五六，九七三人，而後方區域僅有三三，一〇八人，佔百分之七，三四；由此可見戰前工業分佈的偏枯，以及戰時工業廠家在後方增加超過戰前數字的可貴。再就各工業部門的分配和比重來看，戰前那種次殖民地式的畸形狀態，也由戰時比較平衡和合理的分配，矯正了過來，譬如重工業及化學工業在戰前是卑卑不足道的微弱，可是在戰時廠數及資本在全部工業中就佔着優勢，這就是表徵我國正在開始建立一國自主的工業，不能不說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假若能夠這樣繼續的培養下去，說不定這戰時後方茁長的萌芽，會開出燦爛奪目的花朵。可是，經濟是不可分的，在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的結合以及二者更與官僚資本的交織下，這剛剛茁長的民族產業幼苗是不勝其摧殘和壓迫的。

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商業原是服役於工業的，商業盈餘是決定於工業利潤的，所以商業資本的發達往往能夠促進工業的發達。但在次殖民地式的社會，商業資本對於工業不但不能促進，反而會起腐蝕及權毀的作用，戰前中國的商業資本是服役於外國產業資本，替它做着提供原料，推銷商品的買辦職務，到了戰時，商業資本却一方面與官僚資本相結合，串演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好戲；一方面又與土地資本相裹結，造成了「寸地千金」，「米珠薪桂」的傑作，這一好戲，一傑作，不惟將正常的生產事業陷入無底的深淵，就是整個的社會組織，經濟形態亦爲之導入紛亂，擾攘，僥倖，投機的天地。

由於商業資本的變質，它的數量就發生畸形膨脹的現象，單以重慶爲例，據三十一年年的調查，全體工業廠號約爲五萬家，工礦兩業所佔的百分比不及百分之二十六，而商業部份所佔的百分比竟達百分之七十三強，再以銀行的放款性質來比較，重慶二十六家銀行錢業放款於商業部份佔全部放款中百分之九十六強，工礦兩業放款尙不及百分之一

(二十九年調查)。由此可見商業資本猖獗到甚麼程度，但請還是前三五年時的情形，後來的程度和數量恐怕只有朝前走的一直上昇，只消看商業銀行錢莊的增設不已，就可得到最好的說明。

最後再來看農業的情形，我國的農業由於已耕地面積的不大，而人口又異常的衆多，因比耕地不足乃成爲農業中的主要問題，據一般的估計，我國每人平均所攤得的已耕地大概是三市畝左右，合〇·二公頃，與其他各國比較，只有阿根廷加拿大人的十一分之一，澳洲人的十分之一，美國人的七分之一，丹麥人的四分之一。假使已耕地雖少，而墾殖指數很高，那也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可是據一般的估計，二十六省（蒙古西藏青海西康未列入）的已耕地面積約爲十三億市畝，而此二十六省的土地總面積約合一百億市畝，因比中國的墾殖指數約爲一三·〇。這個墾殖指數若與世界各國相比，除超過新開闢的澳洲、加拿大和阿根廷外，其低的程度只有匈牙利丹麥墾殖指數的五分之一強，德國指數的四分之一強，意法兩國的三分之一。已耕地少，墾殖指數低，這就表示農

業方面會發生生產不足的問題。戰前有大批洋米進口，未嘗不是上述的原因所導引。不過，假若農業生產力能夠積極的發揚也未始不可彌補已耕地少的缺陷，但根深蒂固的農業生產關係，主要是土地分配關係，錯制了它的進步，阻礙了它盡量量的擴展，從而農民生計困苦，農村經濟亦因之不能繁榮。

抗戰時期，表形變化，而實質則變本加厲，更趨惡劣。如農產品價格的扶搖直上，本是繁榮農村的好機會，照正統派經濟學的法則，某一種物品價格的高漲可能招致大量的投資，進而促成生產力的強化，不錯，因糧價的高俏，大批的資本是朝着土地方面投資，於是土地集中的現象急遽的展開。如華北在戰前是以自耕農佔多數而著稱的，可是在戰時，同樣也顯示出地權在集中的途程邁進，據西北大學陝南經濟調查團在陝南的沔縣，漢中，城固，鳳縣調查一，三五一一個村戶的報告，其中不到調查總數百分之十四，一一的地主富農，竟佔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土地，而佔調查總戶數百分之八五，八九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却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土地，僅及地主與富農所有土地的三分之

一。其他如四川平原，昆明附近，以及黔西，桂東，粵北一帶更是資本逐鹿之地，如四川的大地主佔地三四萬畝至三四十萬畝的極爲平常。照理說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應該促進大規模經營的出現，與農業生產方法的改進，這是歐美各國農產進步的分例，但是在中國舊的農業生產關係之下，再加上戰時官僚資本與商業資本的攻入農村，使這正常的路徑也爲之變異。因爲他們的爭購土地，與其謂爲投資，毋寧謂爲投機，從而對於土地並不視爲農作的手段，而只將它當作待價而沽的工具。農業的生產不用說日趨萎縮，甚至於許多地方竟將其間散荒蕪，這還能談得到農業經營方式與生產方法的改進？所以，一般的說來，戰時的農業經濟是困頓的，畸形發展的。

就上述工商農三方面來觀察，在戰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有着良機與需要，所以也有相當的進步，但同時由於落後的生產關係與條件的束縛，阻礙了正常發展的進程，因此，戰時的經濟遂由物價高漲來作爲表徵，一切的經濟活動都在隨着物價的旋風而轉動，旋風愈趨愈烈，則正常的經濟活動更離脫正軌。

說到物價高漲，大家都認為通貨膨脹的結果，一個國家在為民族爭生存的戰爭當中，為着軍費與政費的開支，來增發通貨，是必然的手段，尤其是在稅源枯竭，國土大半淪陷的我國，更是不可避免的方法。但是所謂通貨膨脹，可以說是一並不源於一般產業需要的一國通貨數量的增加，所以測量一國的通貨膨脹情形，應該以產業的需要來對比，譬如通貨增發是流入於生產的一途，生產的物資伴隨着急遽的增加，那一國的通貨數量與物資數量仍可保持相當的比例，交換的尺度也無大變化，那麼物價仍可穩定於相當的水準。照戰時產業的需要來說，無論工農兩個部份都需要很大的資金來作設備上與方法上的擴充與改進，俾能增加生產數量以應戰時的需要，可是，實際上通貨是增發了，而產業的需要並沒有滿足，這就是因為大多數的資本都變為官僚資本，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專用來作投機或囤積的勾當，於是物價的騰踴遂至永無止境。

抗戰勝利結束，國土重光，人民的心理都朝着光明遠景展望，按理說，物價只有日漸低落，至少也應該釘住於戰時的水準；因為通貨的流通區域廣，抵消了數量上的膨脹



現象，人民的樂觀情緒除了疑懼的心理，不至於重物而輕幣，因此物價是惟有走下坡路的。可是，實際上除了勝利後的數月來物價曾低落外，本年起，物價反而兩步當一步的朝前跨，弄得一般人都環顧途離大惑不解，都歸咎於政治的糾紛，交通的破壞等等。固然，政治的糾紛，交通的破壞使國內政局不安定，物資不能有無相濟的調劑，皆是物價騰踊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知道經濟本身方面的破綻，仍是造成目前經濟危機的主因，質而言之，目前經濟的危機乃是戰時經濟形態的總暴露，它還是一脈相承的表現其特點。

民族工業在戰時已經奄奄一息，自然不能供給戰後廣大的需要，農業品由於生產條件的限制不能大量生產來補償被破壞農村的損失。因此，物資在供求不相應的情形下，促成價格的高漲，由於物品價格的高漲，工農的生活費增加，於是物品的成本也增加，如此遞增不已的互漲，已經危機四伏。再加上官僚資本的投機，囤積，鼓動，更是推波助瀾，靡有止境。於是外貨有傾銷的罅隙可入，市場為之分化，殘存的民族工業真正達

到了難延喘息的苦境。所以，真正的說來，中國的經濟危機是由于產業部門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後天的失調和病魔的糾纏所致。先天不足就需要竭力的培補，工業化就是最良好的補劑；後天失調而引起的病魔，就應該痛下針艾，剷除落後封建勢力代表的官僚資本，就是最切要的手續。病魔不除，不能談滋補，因此我們得先談針艾，後說培補之方。

官僚資本是封建社會下的產物，在中國早已有之，有人在分析西漢一代官僚資本形態的發展時，歸納為幾種方式。內中以主符財政、糧食而借辦理運輸中報假賬的田延年式；利用機要地位，洩漏消息的張湯式；以做官所得，投資田產的張湯式三種最是發達捷徑。但官僚資本還有與商業資本結合，因而日漸發展的另一種形式，故有人又說這是當吳楚七國事變時用高利貸和長序列候做生意的無鹽氏式了。所以現在的官僚資本，也可說是上承餘緒而發揚光大的繼承者，無怪要聲勢赫赫不可一世，原來是淵源有自，當然不同凡響。可是，由于時空的不同，在彼時的中國，官僚資本對於整個的經濟形態還不能發生了不起的作用；但在現時的中國，情形就大不相同。例如我們要管制物價以安

定民生，它就利用特權囤積居奇，擾亂市場；我們要緊縮金融，穩定幣值，它就乘機利用高利貸，以剝削社會；我們要轉化游資為民族資本，它就導引游資走向投機的邪路。所有這些行動無不是國民經濟前程的阻礙者，故它的存在就不啻是混亂，落後經濟形態的延續。因為經濟越蕭條，市場越混亂，才更是它大顯神通的好機會。所以要渡過目前的經濟危機而求得安定，必先要將官僚資本連根帶株的剷除淨盡，然後才說得上工業化的開展。

所謂工業化就是各種生產事業機械化及科學化，而其組織與管理也要科學化及合理化。所以就工業化的對象言，凡是生產事業都在工業化範圍之列，不過以工業為中心的指標，各種生產事業應隨此中心而發展。再就方法言，不只生產事業本身要有方法上的變異，就是組織機構與管理方法也應該有進步的改換。由此說來，所謂工業化就是整個經濟形態與動向的革命。由於工業化是經濟革命，它就應該有革命的方法與由方法而達到的目的，明白點說，工業化是用甚麼手段來實現，是以甚麼理想來規範，來指導，這

是實行工業化亟待解決的課題。

歐美先進工業化國家是以盲目的聽任利潤心支配的自由競爭方式達到現代工業化的過程。蘇聯是以流血的革命方式控制整個生產資本的所有權進而控制整個生產，消費過程的計劃經濟來實現。前者是要相當長的時期，後者是要犧牲很多的人命，這都是中國的前途不能容忍以及國情不能容納的辦法。同時，由於經濟車輪的前進，自由放任經濟已成爲輪下的犧牲品，破綻百出。美國的新政，英國工黨的社會化措施，可以說都是正在做改轍易軌的工作，至於蘇聯的計劃經濟經過不少次的脫軌，後來也不得不漸次的加以矯正。概括的來說，歐美的自由式經濟有不及的弊端，蘇聯的計劃經濟有太過的危險，都不是目前經濟車輪所應走以及不得不走的正軌。

我國有自己的國情，自己的實際環境，工業化的實現固然是生存於現代不能不迎頭趕上的工作，而民生主義的實行又是工業化能夠迅速完成以及合理的完成之指標。所以民生主義就是實行工業化方法的和目的，二者不是分離的而是統一的。但由於民生主義

本身就具有計劃經濟的特質，從而它的進程都是有計劃的，有步驟的。我們知道，民生主義的三大政策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與平均地權。而這兩大政策當中的進程與步驟就有不少的區別；同時也是配合實際情形作有計劃的設計。因之，我們要以經濟眼光來判別這種措施屬於何種類型時，那就是獨特的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型。

武力經濟學 (Economic of Force) 的作者佛蘭芒克 (Frank Munk) 在分析計劃經濟的技術時，曾將自由經濟走到計劃經濟的步驟分作幾個階段，他說：

「走向計劃的第一步，是由於獨佔競爭和獨佔本身的瀰漫所造成的剛性的滋長 (Growth of rigidity)，經濟權力的集中，大規模工業的生長，以及近代技術的發展，都足以促成國民經濟中大量的私人的和部份的計劃。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所有工業化的國家，都有這種方式的計劃在那兒滋長。

計劃的第二步驟是「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乃係在公共機關統制之下，指導，限制或鼓勵私人的和部份的計劃，美國的公用事業管理規則，即其

一例：武力經濟籠罩歐洲以前德捷和挪威所立的卡脫爾法，亦屬此例。

從「統制經濟」進入次一階段，幾難辨識，我們姑稱這個第三步驟為「管制經濟」(Administered economy)，其間唯一的差別祇在「管制經濟」是由公共當局作積極的指導，而「統制經濟」則僅作消極的干涉，農業調配法(A.A.A.)下美國農業中若干部門以及復興法案(N.R.A. Codes)下若干工業部門，都可以算作「管制經濟」的例子。

從「管制經濟」進入另一階段，亦難分辨，我們稱這第四步驟為「管理經濟」(managed economy)。指導的(Directed)或管理的經濟是真實的計劃經濟，不過這種計劃並不是一般的，普遍的，而是部份的。政府對於若干部門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運輸、價格與消費，制訂一切主要的政策，但對於其他部門，則並不加以周密的計劃。」

他這段細緻的分析，據他說完全是以福利經濟為着眼點，這是與資本主義以「經濟

（Economic being）為起點迥然不同。由於它是以福利經濟為重心，所以實行計劃經濟的方法是和平的，循序漸進的；演變的，而非突變的。因此，我們談到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的實行步驟，它頗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固然，主義上的不同，以及實際環境的差異，內容上當然有所懸殊，需得另作一番的配置；但大體上，除第一個步驟純是資本主義進步到極度的結果，不能相比擬外，其他的步驟或含義多少有可以採擇的地方。其實，嚴格說來，計劃經濟是一種有意識的行動，這就是說，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於經濟行為作有意識的指導，管理，或控制。至於由私人或團體作自發的計劃或行動，根本是不中用的，甚至於是繫枘的。所以他所稱的計劃第一步，絕不是一個國家執行計劃經濟的第一步，只能說私的團體在其小天地內已有計劃的傾向；可是國家的目的並不能以私人團體的目的相照合，何況國家所轄的經濟部門和範圍是這樣的多而大，怎能與私人團體的對策和方法相同呢？由此說來，所謂計劃的第一步實無必要，而且不能夠算作計劃的開始。真正計劃的開始，應該是它的第二步，茲以他的分類作藍本，裝上民生主義

的內容，得出我們的計劃經濟的步驟和概念如次：

第一步統制經濟時期——以消極的干涉，積極的改進為原則。

工業方面 在國家統制之下以限制，改進，鼓勵，配合國營民營（合資及外資方式在內）企業之性質，發展，及創設為動向，以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作根據。

農業方面 以促進生產，改良分配關係為動向。以開發荒地，改革農業生產方法，規定標準地租，規定私有土地地價徵收累進稅為內容。

第二步管制經濟時期——以積極的限制，消極的管理為原則。

工業方面 以限制民營企業之性質，指導民營企業的動向；伸張國營事業的範圍，擴大國營事業在整個經濟形態中比重的力量為主體。

農業方面 以保障自耕農，扶持半自耕農佃農為動向。以限制耕地之使用，招租，分割，承繼，及公私土地所有權之轉移，與土地漲價歸公等為



手段●

第三步管理經濟時期——以全部計劃為原則●

工業方面 在國家統籌及管理之下，關鍵工業全部國營，作有計劃的生產，民

營企業由政府控制生產，作有計劃的分配。

農業方面 實行集體農場制，實現耕者有其田。以發行土地債券，照價收買土

地，並作有計劃的分配及生產等為重點。

上述的計劃僅是一個大綱，或者可以說僅是一個粗枝大葉的輪廓。內容方面未提到的如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貿易政策等都需要分別的釐定與配合。至於實行的方面，也有很多方法及技術方面的問題，值得再加考究。不過，這大綱已顯示一個著明的趨勢和特點，就是它是和平的，漸進的，而且步驟的內部也是互相響應和調協的，以後關於內容的補充和方法的採用也應該以此為準繩●

總而言之，民生主義的實行，就是中國經濟的新生，也就是使中國能夠工業化唯一

的寶筏，怎樣策劃實現，不止是政府的責  
共同具有的偉大使命。

二是全國國民爲求實現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 五 交通的維護與發展

「交通爲一切建設之母」，一國的文明程度就可以交通進步的情形作成測量器，因爲無論就國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看，交通都佔着重要的地位，比方來說，假若國家可以比作人身，國防，政治，經濟各部門可以比作四肢百骸，那麼交通這一部門就可比着灌輸血液的動脈，要四肢百骸健全，人身才能健全，但是四肢百骸的健全，要以動脈的健全爲前提。蔣主席曾說過：

「在海禁未開，閉關自守，一切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時代，還看不出交通的重要。近世以來，世界交通日益發達，五洲各國，儼若比鄰，一個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之能否進步，以及一國國家的強弱，差不多完全決於交通之是否便利。」

由此可見交通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是如何的重大，關係是何等的密切。現在爲着證明這一論斷的確切，不得不將交通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作一簡略的檢討和說明。

甲、交通與軍事 現代的戰爭規模龐大，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極鉅，須有大規模和高速度的交通，輸送後方人力物力去補充，去接濟，才能支持作戰的力量。遠在一百多年以前，拿破崙就說過：

「一支軍隊的力量，和力學上的動勢一樣，乃其體積與速度相乘之積。」這就是很明白的指出，國防軍的力量與國內交通發達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我國八年來的抗戰，也深深地領略到交通的教訓，主要的鐵路交通僅僅幾條幹線，而內中的幾條並不是最初就有着國防的打算而作一種計劃性的興築，差不多都是在帝國主義的勢力撞開門戶以後，無形中適應帝國主義的勢力伸張和掌握，才開始鋪設的。航線方面也是如此，記得有一個外國作家會形容我國的揚子江爲「釘在中國地圖上的外國河流」，這也足

夠說明航線的開闢與帝國主義的勢力擴展有着怎樣深切的關連。公路方面開築的時間較遲，更說不到能夠完全補助鐵道的不足。在此種交通條件之下，一旦對外戰爭開始，前方與後方，沿江沿海都市與內地，自然談不到交通的緊湊，聯絡的便利；從而人力物力不能源源不絕的供應，脫節的現象隨時的發生，國家的門戶不用說不能保障，就是戰爭轉移到內地以後，也由於交通的欠缺，作戰的力量往往也受到減削的影響，這就是交通與軍事一個最現實的說明。

乙、交通與政治 談到中國歷史，大家都會聯想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兩句話。爲什麼會有這種循環性的因果律存在？交通的不便利起碼是其中主因之一。因爲交通不便利，若干有野心窺竊朝器者，就可憑藉勢力，招兵買馬，相機起事，而中央政府以鞭長莫及，加以容讓，遂致坐大。同時，因爲交通的梗阻，民族意識往往很難融合成固定的型範，因此易於分裂。如美國南北戰爭，已經損失等量的生命和財產。但南北兩方民衆的意識還是有如冰炭，不能相容。到了鐵道貫通以後，無形中嫌隙消泯，相趨

和樂，而對立的武裝也說煙消雲散。自國民元以來，一直存在着軍閥割據與省自爲政的局面，根本原因也在於交通的不便，政令不容易貫徹，以致政權不能集中。反的方面，割據地方的人，爲着愚弄民衆，鞏固統治，對於交通視爲寇仇，所以要他們來發展交通，當然不可能；破壞交通則是拿手好戲。這就是中國難於統一的原因所在，也就是交通與政治關係密切的證明。

丙、交通與經濟 中國的經濟，在本質方面是封建及次殖民地的經濟，在外形方面是破碎支離及不平衡的經濟。爲什麼封建及次殖民地的經濟必然地要表現破碎支離和不平衡的外形，交通的不便利，是主要原因之。蔣主席會說過：

「我內地各區之間，缺乏彼此往來的現代交通工具，甚至於內地各區彼此往來，還要經由國境以外的外國鐵路和航線，於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割裂爲幾個區域經濟，每一區域，以一兩處租界駐兵區爲中心，受其支配，特爲門戶，試想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中國若與帝國主義作戰，則帝國主義者封鎖我少數口岸，即足以停滯我全

國經濟的命脈。⌒

交通不便造成的區域的經濟，就是破碎支離的形態之一。但這局限於沿江沿海地帶受帝國主義勢力控制的地方而言。在深遠的邊區和內地，則由於封建勢力的作祟，又有割裂最深的省單位經濟出現。這種省單位經濟以經濟獨立為標榜，自治自足為手段。為着一省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惜以鄰為壑。結果各省之間互成敵視，經濟分工不可能，經濟合作更談不到。這與德意志帝國尚未成立之前，國內四分五裂，互相組織關稅同盟以資抗衝的局面相類似。在這種破碎支離的情況下，整個國民經濟當然有土崩瓦解的危險。

其次，由於交通情形的差異，整個的國民經濟遂表現不平衡發展的形態。在東北，東南各省物產豐饒，交通便利，因而經濟繁榮，人口蒼萃。可是西北，西南等土地澆薄，交通不便，遂致經濟蕭條，人煙稀少。所以有人說：「中國的經濟情形，是一幅經濟的歷史演化圖，平面的鋪在我們面前！」這就是由於各地方的經濟情況，有着莫大的懸殊。從漁牧游獵的生活，原始農業的生活，以至於現代工業時期的生活，都可在各個地

方找得出模型來。但是，假使有貫貫東西南北的交通線，使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那麼這種不平衡的經濟形態自然會逐漸的泯除。而整個的國民經濟也才能在分工合作的方式下，有欣欣向榮的表現。

丁、交通與文化 文化本來是一種綜合性的，人類知識交流的產物。交流的速度愈深，範圍愈廣，則文化的表徵必更形發皇光大。有些人將世界的文化分作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這只能說是爲一種說明的假定，以便從事於演繹的推演，實際上文化是整個的，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是互相表裏的，要兩者都具備，才是理想的文化。但是，在理想的文化未實現以前，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各民族間，以至於一民族之內，事實上是存在各自的特殊文化，以及程度不同的文化。怎樣將這些特殊的文化以及程度不同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無疑的交通是最主要的利器。

在我國歷史上，文化發達的所在，大概都在交通發達的地方，如周秦漢唐的文化盛於黃河流域，因黃河便於運輸之故。中古以降，文化並茂於長江或珠江流域，也因爲珠



江及長江有交通之便。民國以來，革命思想的勃興，文學思想的變異，都可以說是海通以後的結果。總之，這種交通傳播文化的例子，無論中外，俯撫皆是。今後要將中國各地的民智提高，風俗改善，融合成功為一個整體的統一的文化，惟有盡量的開發交通；要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使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夠宏揚於世界，也惟有盡量的推廣國際交通。所以交通與文化的關係是很夠緊密的。

交通與各種建設的關係，以及我國交通貧弱的情形，由上面簡略的檢討，已可明白其大概。現在進而檢討鐵路，航業，公路的具體情況，更足以使我們警惕。

先就鐵路來看，我國已築成的鐵路不到一萬五千里（東北的五千里內）。若和美國的四十萬公里相比，僅佔二十七分之一；若和印度的六萬公里相比，也僅佔四分之一，若再和國內幅員狹小的英國來比，英國就有鐵路三萬三千里，而這樣廣土衆民的我國僅有一半都不到的鐵路，這是一幅多麼落後的比照。鐵路既然這樣短少，假若有足夠的機車貨車，也未始不可用增加班次的辦法增加運輸力量來彌補於萬一。可是，據統

計，在民國二十四年底，所有國內的鐵路共有機車一，二七六輛，其挽力爲一〇，三〇〇噸，但平均年齡超過二十者，已佔百分之六十。貨車共有一五，五〇〇輛左右，其載貨力爲四四七，〇〇〇噸，但損壞待修者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機車貨車的數量本來已是少得可憐；再加上超年齡和損壞待修的情形，就不管是將原有的數量打一個折扣，這真是少上再加少，運輸能力的強弱可想而知。

再就航業來看，我國內河及沿海船舶，據戰前估計爲一百四十餘萬噸，與英國的輪船噸數一千七百餘萬噸相較，真是相隔霄壤，就是和日本的五百萬噸相比，也覺瞠乎其後，況在此一百四十餘萬噸的船舶中，國籍輪船僅佔六十餘萬噸，尚不及總數之半。且全國輪船公司保有輪船總噸數在一千噸以上者一百六十餘家，五千噸以上者僅二十四家，此二十四家保有輪船之總噸數僅三十餘萬噸，而外國輪船航行我沿海與內河者就有七十餘萬噸。由此可見我國水上運輸能力差不多都是操在外商之手。

最後來看公路，在二十一年全國經濟委員會開始督造各省聯絡公路時，全國僅有公

路六萬餘公里，到了抗戰前夕，全國公路增爲十一萬公里，戰時在後方興築的總一萬公里，截至目前止，全國也僅只有十二萬公里的公路。我國有這樣大的幅員，有這樣多的人口，而僅有這樣數目的公路，交通的困難，不言可喻。

鐵路，水道，公路三種運輸能力既如比的薄弱，再加上抗戰時期日本大規模的破壞，交通的破碎，運輸力的減削，已到最可憐的地步。抗戰勝利結束，復員工作急急開始，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復交通，去歲二月美國國家設計協會擬有一個關於中國的復員的方案，內中就曾說：

「中國之救濟及復員工作，首要者爲交通之改進，交通愈便利，則中國自身之資源愈便於分配，因而對外國物資之需要愈可減少。此工作可雙管齊下，一方面開闢港口以暢對外通路，一方建立內部交通體制，以便國內之運輸。」

這段話的立意，完全是着重於物資的供應及分配一點，來說明交通改進工作的重要。事實上，還有其他重要的使命也莫不需要交通來完成。如受降，遣送俘虜，接收，軍公教

人員復員，義民還都等皆是。但最重要的還有各地經濟方面盈虛的調劑，所有物資方面，金融方面，物價方面，都要以交通的便利作爲挹注，協調，平衡的條件。若拿經濟學方面的術語來說：要使易地效用能夠盡量發揮，供需律能夠圓滑的運用，惟有改進各地的運輸效力。因此，改進交通實爲復員工作最迫切的課題。

可是，復員工作開始以來，我們所面臨着的，不是交通改進問題，而變成交通維護問題。由交通維護問題的提出，我們就可聯想到交通有破壞的情事發生。不錯，自勝利結束迄今，貫通南北的鐵路幹線無時不在破壞之中，除京滬杭能通車外，如平漢，津浦，膠濟，瀋海四條動脈，就受了破壞而阻斷。水流方面的河流，不能築堤防犯，反而隨時阻撓，不特此也，甚至掘堤放水，將人民葬身魚腹，田園廬舍化歸烏有。於至公路不用說更隨時在修改形狀，七截八斷。假使不是日本已經投降，我們還認爲是好多勇於抗戰的人，在努力，在拚命作戰路上的佈置，縱使毀滅了這已夠可憐的鐵路，犧牲了十萬百萬的人民和其相依爲命的田園廬舍，掘壞了內地唯一交通命脈的公路，也在所

不惜，也在所不顧。因為要爭國家民族的獨立和生存，要摧毀兇惡狠毒的唯一敵人，不得不忍痛含悲的出此一着。可是，勝利的爆竹聲仍有餘音在耳，萬眾歡騰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並沒有因為事隔將近一年而完全消逝，那麼，上面的現象決不是夢中，而是現實。但究竟誰是在做着這種甘冒大不韙的工作？我想大家一定知道，也明白。只要將他們過去一貫的行爲來覆按一下，也決不奇怪！因為在他們的眼光中，一切都是手段，一切都是工具，所以儘管掛着漂亮的招牌，裏面賣的是甚麼藥，完全可以想像。總之，一切都在「鬥爭」，「清算」之中，不止對人要「鬥爭」，「清算」；就是，鐵路，水道，公路自然也可算在「鬥爭」，「清算」之列。因為交通便利的結果，人民的文化水準可能提高，那一味專橫愚昧的暴力統治，豈不發生了動搖？經濟繁榮，人民都可安家樂業，那又如何能煽動人心，裏脅羣衆？因此，交通也遭了厄運，也成爲「鬥爭」，「清算」的對象。破壞，毀滅的手段自然邏輯地一脈相傳。於是良善的人民是有家歸不得，飽受八年抗戰滋味的義民是有鄉不能歸。這還不說，在經濟上竟演成生產停滯，經

濟失調，物價高漲，生活艱難的現象。使全國多數的人民在生活的重荷下苦苦的掙扎而不能自拔，這倒底是誰的賜與？閉關自白的戎首不能不操振有詞，來掩蓋這無可寬恕的罪行，交通是用來運兵，就成美麗而堂皇的借口。誠然，交通是可以運兵，猶如凡是刀都可以殺人一樣，甚至於凡是人都難免不變成攻擊性的武力一樣。因此，最好如秦始皇把所有的兵器都拿來融毀，鑄成銅人，以銷鋒鏑。若還嫌不夠安穩，更可進一步搬出張獻忠殺殺的老辦法來，將人類都殺淨！殺到後來，就是自己的伙伴也難免不受一刀之苦，因為伙伴也是人，誰又想到他肚裏裝的是什麼呢！由此推演的說來，交通的破壞是頗合乎他們所謂辯證法邏輯的，因為交通可以調劑經濟盈虛，人民可以獲得安定的生活，這是正；但是交通的本身蘊孕育着運兵的因子，結果必否定其本身的存在，革命！破壞！必然要爆發，本身歸於毀滅，這是反。交通破壞後，經濟發生紊亂，人民顛沛流離，惟有加入暴力政治，於是政權獲得，又來重建新的交通，這就是合。但是，正反合是循環不已的，所以交通也就在破壞，重建的途中轉變，直到無可運的人，無可運的

物時，交通的理想終極目標實現，革命的大功告成，這就是交通的辯證發展。可是，人要求生存，同時就有理性的思考，來判斷當前的現實是否合乎生存的要求的。從而不管理由是經過多少的粉飾，說得好像冠冕堂皇；但事實的鉄拳終久要擊穿這紙糊的假面具。目前由破壞交通而引起的經濟蕭條，民生憔悴，倒底「孰令爲之，孰令致之」。總之，我們爲着解除經濟的危機，挽救人民於倒懸，惟有不顧計一切的來維護交通。爲着建立現代的國防，統一的民主政治，健全的國民經濟，普及的，向上的文化水準，惟有積極的規劃來發展交通。

好在我們有了「國父的實業計劃，它就是今後發展交通的圭臬，有了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指示的數字，它就是最近十年努力的目標。換句話說，發展交通的大前提已經獲得，現在只要我們能夠利用現代的技術，配合科學化的管理，按部就班的去實行。那麼這交通之花，就能發揚光大而成爲建國成功之果。

## 六 教育的改進與普及

教育的功能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因為時代是前進的，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環境是特殊的，要用一個概括的定義來道出它的特質是不容易的事。在歐美個人自由主義盛行的國家，社會環境已經民主化，物質環境已經現代化，所以教育的目的，只是在造成社會上有效率的人，使其具有適應社會的能力為已足。但是適應社會的能力，不能構成生活的全部，這就是說人類生活是向上的，不能以現狀為滿足。因此教育的觀念亦隨之而有變異。波森(N. L. Bossing)在他所著的中等教育的職能(Progressive Method of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一書，對於整個的教育功能，有一段名言，他說：

「教育的識能，在調整個人對於環境的關係，一方面使人適應他的環境，同時也改造他的環境，以期個人與社會都能獲得最大的滿足。」



以適應環境，改造環境來作爲教育的功能，以個人與社會都能獲得最大的滿足作爲測驗教育的效果，這是比較合理的說法，這與杜威所說的教育是「社會的歷程」的說法，同樣含有前進的思想在內。不過，嚴格的說來所謂適應環境，就含有動的意義，也即是含有進步的意義。因爲環境並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從而適應環境的能力也不能是限定在一定標準之下的。同時，人類的生存欲望是向上的，環境也只是日漸朝上走的，從而適應的能力就應該是進步的。因此，適應環境與改造環境，就是一事的兩面，而歸趨是相同的。甚至可以說兩者的進程也是統一的，因爲適應中就含有改造的成份，改造中就含有適應的成份。要有前者，社會才能自然的漸次進步；要有後者，社會才能獲得一致的諧合與協調。教育的功能就在將兩者配合的發揮，使人類幸福，社會進步成爲統一的歷程。

中國是一個建國未成，而又樣樣落伍的國家。但爲着造成一個獨立，民主，工業化的中國，爲着能夠生存於今日的世界而成爲遠東和平的基石，就不得不埋頭於建國的工

作。可是，由於民主的基礎未奠，民生的日趨萎縮，文化水準的低下，形成建國中的障礙，尤其是抗戰八年，淪陷國土大半，經濟頹廢損失，物質基礎，已備感不足，而精神基礎由於社會風習的敗壞，奴化教育的施行，更遭毀損而無餘。因此，我們一方面要適應復員建國的環境，造就能夠適應復員建國需要的人才；一方面要改造落伍的貧弱與無知的環境，以免成爲復員建國中的障礙。中國的教育功能就應以此二者爲目標，努力以求其實現。

中國的新教育制度說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單就民國成立以來說，也有三十餘年的歷史。但教育的功能，無論在量和質方面都缺少長足的進展。

先就量的方面來看，文盲的數目截至民國二十九年止，按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估計，已識字者佔全國總人口四億五千萬中百分之二十，即九千萬人。不識字佔百分之八十，即三億六千萬人。這就是表明全國人民中，只要五個人在一起，就有四個人不識字。在此種可怕的數字表徵之下，還談得上適應新環境，改造舊環境嗎？很多的無知現象

自然成爲社會中的特點。再看學校教育，按七七事變以前的統計，專科學校有一百零八所，學生四一，九二二名。中等學校三，二六四所，學生六二七，二四六人。全國入學兒童共爲一八，二八五，一二九人。這也是表明全國一萬多人中只有大學生一名，全國七百多人中只有中學生一名，全國三十多個兒童中只有一個兒童入學。由這種數字的比較，可以看出作教育中堅的學校教育是怎樣落後。還談得上供給大批建國的人才？還談得上文化普及嗎！抗戰期間，學校播遷，幾經艱難。雖有莫大的努力，一面恢復，一面創設，然終限於戰局及物力的影響，增加的數字亦屬有限。

次就質的方面來看。過去的教育多半是剗襲歐美的糟粕，不能因應自身的環境作新穎的創施，結果是教育以培植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一切都爲個人謀打算，而不以大衆爲標的，個人與社會無形中隔離起來。譬如說自由，只會求個人的自由，而不會顧及整個社會的秩序；言職業以升官發財爲捷徑，而不會從事於其他建設性的工作。因此，有官可升，有財可發的事情則人浮於世，需要埋頭苦幹，不計困苦榮辱的事業則有事無人。

從而社會上形成人與事的脫節。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的脫節，教育的功能也就為之變質。所謂適應社會環境變為適應個人升官發財的環境，所謂改造社會環境也變為改造個人的物質環境。直到神聖的民族戰爭爆發，不啻是給國民來一次偉大的心理教育，五千年來傳統的國魂為之喚起，愛民族愛國家的赤忱，表現於茹苦含辛的行動中，抗戰之終獲勝利，導因未嘗不在於此。但是，戰時的情感是衝動的，需要教育作理智的爬梳，方能保持這種心理上的優點於永久。否則，感情奔放的結果，就會流於空疏浮華，不切實際的一途。戰時的教育水準為甚麼低下？學校的風氣為甚麼變為囂張動亂？這都不能不說教育不能因時制宜，善加導引所致。

戰前及戰時的教育情況已如上述，過往的缺陷所在，自可一目了然。在此復員建國時期，教育不啻是一建設的橋樑，實在不能再事蹉跎。因此，我們就得針對過往的缺陷，審察目前的實情，瞻望將來的前途，作一番新的措施。

中國的教育無可否認地是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

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標，俾能實現「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的建國目的。由於宗旨，目標的確定，目前教育的復員與建設，就要配合起來作積極的行動。

先就量的方面來說，無論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均應該太大的擴充，以便能夠掃除文盲，普及知識。同時，要根除教育是少數人專利的階級限制。凡是人民既有納稅的義務，就有受教育的權利。因此教育不再是少數人的教育而是全民的教育；不再是少數慈善家，或熱心公益人的事，而是政府的責任。爲着要實現這種普及教育的責任，所有的初等教育應該完全是義務教育。中等高等的教育應多設公費名額力求普遍，國民教育更應該分文不收，送書送紙筆，以便貧苦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不特此也，凡是學校所在地，爲着補救國民教育機構的不足，學校就應該盡力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所有當地文盲，要由它來掃除，失學的成人要由它啓迪，停學就業者要由它來補習，其他迷信，不衛生的形態要由它來破除糾正，如此教育方面的量的缺陷，才能有彌補之一日。

次就實的方面來說，今後的教育應以謀大眾福利爲出發點，增加個人的社會價值與社會效能爲新的教育哲學。因此，關於思想方面，制度方面均應該有重大的興革。

甲、思想方面 過去新教育的創設是脫胎於歷史深長的科舉制度，所以，就是在民國成立後不久，多數人都還將學校和科舉相比。他們往往認爲小學畢業，就是中了秀才，中學畢業就是中了舉人，大學畢業就是中了進士。在許多窮鄉僻壤的地方，一個子弟畢業回來，親戚鄰居甚至不相識的人都要前來相賀，送禮放爆竹以至於大排筵宴，成爲必然的點綴，而這畢業歸來者好像身價增長十倍，一般人也就另眼相看。這種現象的誕生，無疑地還是封建思想的遺毒，認爲學校就是科舉的變形，中了舉的人，那一個不升官，那一個不發財？畢業學校的人自然也應該升官發財了。社會有這樣的期許，個人有這樣的自負皆可不論，而主持教育的學校不惟不能矯正，甚至於隨波逐流的助長發展。如過去富家子弟在學校內的飛揚跋扈，學校對此類學生功課的放縱，以至於策動同學作團體的組織以爲集團獵官的行動等都可說直接間接受封建思想的傳染所致。到了歐風美

雨漫天而來，教育方式亦爲之轉變，所有教學方法，教育制度也以模倣歐美爲能事，於是個人主義的教育思潮蓬勃一時，認爲教育的目的只在發展個人的個性及興趣，能夠在社會中爭取個人的生存爲已足。因此，自由的風尚，也就遮天蓋地，聲勢浩大莫之能禦，這種極端自由的結果，弄到學紀蕩然，教師尊嚴掃地，而受教育的個人則養成能力低下，只知自由，而不知守法的份子。所以，有人批評這種教育道：

「自由的個人主義之教育形式，雖然名義上是爲發展個性效力的，可是在這些形式中正缺乏着個人負責的教育。」

由於缺少個人負責的教育，愛教育的個人就成爲不能負責任的個人，既不能適應社會，更不能改造社會，這就變成個人與社會的脫離。我國過去的教育結果，也就常常變成個人與社會隔離的狀況。社會的不能進步，原因就種於此。我們知道，歐美的教育完全是以民主主義爲出發點，所謂民主主義應該是個人自由與社會利益相對的，杜威就說

過：

「如果民本主義確含有道德的與理想的意義，那末民本主義，一方面個人對於社會都須有所貢獻，以報答所受於社會的利益；一方面各人也須獲得機會去發展他們的特別能力。如在教育方面，把這兩個目的劃分，便是民本主義的致命傷。」

我國的教育就將這兩個目的加以割裂。只讓各人獲得機會去發展他們的特別能力，就沒有責成各人都要報答所受社會的利益。結果不僅演成個人與社會的隔離，進而變成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因為在封建遺毒尙未肅清的社會內，一般都以升官發財爲榮幸，從而，這種思想就與個人自由思想相結合，認爲升官發財是唯一發展特別能力的場所，政治和商科的畸形發展，就是它們結合的成績。所有這一批一批爲個人打算的自私者，絕對是與社會大眾利益不能相容，相調協，自然就發生對立的情事。

中國今後的社會是民權普遍，民生發達的社會，教育應該成爲過渡的橋樑，使上面的社會早日實現。因此，今後的教育就得以民權的教育與民生的教育爲骨幹。所謂民權的教育，是個人與社會並重，自由與守法合一的教育。由於個人與社會並重，個人的利



益就不得妨害社會的利益，甚至於要以社會的利益爲前提。由於自由與守法的合一，自由就不會趨於極端而妨害社會秩序，甚至於要以守法爲自由的前提。前者實行的目的，在祛除封建思想所演化的只爲升官發財的遺毒，使受教育的個人能爲社會的利益而有所貢獻。後者實行的目的，在矯正個人主義式教育的偏狹，使每一個個人養成在社會秩序之下健全發展自由的中堅份子。所謂民生的教育，是理論與技術並重，知識與生產合一的教育。前者的目的在打破只重理論欠缺技術經驗的學究風尚，後者的目的在匡救知識與生產的脫節，而使「學以致用」的目的與生產勞動的實際連結起來。有了民權教育，民權主義的根基就可以奠定而永固；有了民生教育，民生主義的建設就可順利的完成。

乙、制度方面，制度是教育思想的產物，教育思想既有上述的改進，則制度方面當然因應的要有改革。爲着實現民權教育，教育制度就應該平等化與普遍化，使每一個國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爲着實現民生教育，教育制度就應該科學化與生產化，使國家經濟建設所需要的人才能夠源源供給，不遺匱乏。

教育思想與制度一元化之後，其他有關的技術問題自可順理成章，逐一的解決，勿庸再為詳述。

歸納的來說，民權教育與民生教育就是目前教育改進與普及的指標，也即是養成個人能夠適應新環境，改造舊環境的新教育之準繩，如何付諸實行，這就是復員建國途程的義務和責任。

## 七 衛生的革新與擴展

「健康就是財富」(Health is wealth)，這是歐美最流行的格言，說明身體的健康也和他們素所看重的財富一樣重要。其實，財富是一個人心思才力的產物，而心思財力的充沛和發展，完全寄託於健全的身體。所以往往有許多身體不健全的人，他的思想往往也是不大健全的，以不健全的思想來求增加正常的財富，這可說是「緣木求魚」，同時，財富雖失而可以力致，健康若失則返回維艱。因此，我們就說健康重於財富，也並非過份之詞。「國者人之積」，要有強盛的國家，一定要有身體強健的國民。英國人說過：「三等體格的國民不能造成一等的國家」，而我們一再的高呼要實現富強康樂的新中國，這都是證明健康的重要性，不容再行漠視。

自從衛生學識突飛猛進以後，人類的健康也就有了很確切的保障，從而現代的國家無不孜孜於衛生的講求。返觀我們的國家，則衛生的設施及研究均只有幼小的萌芽，不

足以適應大眾需要，不能追躡於時代的前趨，人民的健康情形自然不良而落後。現在我們就來檢討一下我國國民健康的程度。

平均壽命與死亡率是測量一個國家健康情形的水準器，根據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紐西蘭嬰兒出生後的希望壽命，男子爲六十五歲點零四，女子爲六十七歲點八八；美國男子爲五十九歲點三一，女子爲六十二歲點八三。中國方面，據已往衛生專家的估計，嬰兒初生時平均希望壽命不過三十歲。平均壽命的短少，就是死亡率太高的表現。尤其是嬰兒方面的夭折，最爲嚴重。按戰前的統計，各國每年每千嬰兒中之死亡人數如下：日本爲一一七人，義大利爲一〇〇人，比國爲八六人，丹麥與法國均爲六七人，德國與加拿大均爲六六人，英國爲五九人，美國爲五七人，瑞士爲四七人，瑞典爲四三人，澳大利亞爲四一人，荷蘭爲三九人，紐西蘭爲三一人，平均的說來，各國的嬰兒死亡率均在一百人左右，但我國每年每千嬰兒中的死亡，據估計約在二百七十五左右，這就是說生產一千嬰兒就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不能存活。人口的量的方面當然要受到莫

## 大的影響。

平均壽命的短促與死亡率的高，自然是國民的體魄不夠健康。而體魄的不夠健康，就是先天的遺傳沒有講求與後天營養不良與疾病的摧殘兩種原因所使然。

自然孟德爾 (Mendel) 定律發明以後，遺傳學的領域擴大到人類的選種。從而人的品質也可由人力來加以控制與改良。許多先進的國家莫不注意於此，而出諸消極的或積極的手段，如歐美男女在結婚以前必須交換體格檢驗證書，以至於節制生育方法的傳授，都可以算是開明的消極手段。如戰前的德國對於低能和有遺傳病的人一律打絕嗣針，使其斷絕生育，這可以說是強力的積極的手段。至於我國則歷來沒注意這個問題，相反的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封建思想控制之下，來談優生，擇種，自然有同冰炭。因此，只要是人，就應該生兒育女，不管是白癡，或精神不健全者，甚至有遺傳病者均應該傳宗接代，禍家亦非所計，害國更不用談。影響所及，民族的質的方面就無由改

進。

先天的不良，造成民族體魄的不進步，再加上後天的營養失調，以致疾疫的摧殘，民族的健康不用說瀕于危境。假若人身是花木，營養就是肥料。試問沒有施肥的花木還能夠葉茂盛，開花結果？固然中國是貧，一般人的生計都極艱難。所以沒有餘力來從事營養。這種經濟條件限制，我們也承認是營養不良的原因，可是我們要知道，一般的飲食方式，也未嘗不是造成營養不良的根源。就極淺顯的例子來說，北方人的身體爲什麼比南方人健壯，難道北方的經濟情形優於南方？又如同一樣的蔬菜，因作法不同，而對於身體的效力就兩樣。所以，不懂營養，不講求營養，實在也是營養不良的原因。至於疾疫的流行，則更是中國司空見慣的事。每一年，每一季節差不多都有一二種流行的疫症，捲去若干人的生命，尤其是肺結核病差不多成爲中國人的專利品。所以一般人對於它也就視爲平常，不加重視，傳染所及，達到不能想像的程度。在抗戰初期，全國征兵制實行，但全國無重病適役的壯丁，不達百分之三十。以年算是民族中的優秀份子，但體格檢查的結果，百分之九十有缺點。單是傳染病一項就佔整個死亡率百分之四十二。

，其他疾病會死亡當然也就不少，據估計全國每年有六百萬逾格的死亡。像這些情形都是人口的浪費，就是把人不當人的結果。

抗戰爆發以後，人民顛沛流離逃難各方，生活艱困，營養更形欠缺，據三十二年教育部與中央衛生實驗院合作調查重慶青木關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等四校學生營養及血液的報告。評調查學生一三〇〇人，關於膳食營養成分，除碳水化合物外，其餘各種營養距離標準甚遠，維生素不必論，蛋白質的來源大部份都屬於植物性，屬於動物性者，僅佔總量百分之四。血液檢驗方面，共檢查四百四十二人（男生二九七人女生一一七人），赤血球合於標準者，男生僅三十七人，女生僅二十一人。血色蛋白合於標準者，男生一人，女生四人。血色指數合於標準者，男生二十九人，女生二十一人。學生營養及健康的情形尚且如此，其他一般人更不用談，所以空軍學生往往招不足額，多數都是由於體格不及格而遭淘汰，甚至招募前往印度運輸工人五千名，經體格檢查的結果，合格者不到四百人。

「大兵之後，必有大疫」，上次大疫，我國固不能避免，我們的國家自然更不能脫逃。如勝利後各地鼠疫，傷寒，腦膜炎，霍亂等莫不猖獗異常，蔓延的程度在淪陷區尤爲可怖，不知吞嚥了若干人的生命。本來以八年來拖得奄奄一息的身體，怎麼經得住這種疾病的侵襲，死亡的普遍，自在思想之中。

我們現在從事復興建國的工作，就需要很多的人力來預備，來從事；但是在上述情形之下，無可否認地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難。不過「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我們就得抱這種「亡羊補牢」的決心，來做補救現在，預防將來的工作。謂這種補救預防的工作，無疑地全部建築在衛生的革新以及量的擴展這一基本上。以下我們就提出今後衛生的設施辦法，作爲革新擴展的張本。

甲、實行民族優生政策 在優種雜增，劣種易殖的遺傳律支配之下，一個民族要能保持生存競爭的優勢，必須要有優良的國民代替低劣國民的措施。固然那種強力的方式，我們不願引用，但開明的如頒布獎勵優種增殖的法規，規定結婚雙方交換健康證明書



等都可立即施行。健國必先健種，這是最實現的金科玉律。因此，它不僅是衛生範圍內的問題，而也應該是政治上注意的問題。尤其是封建意識籠罩下的中國社會，更非用政治的力量不能推行順利。

乙、普及衛生知識 前面說過營養不良，因知識不夠也是一個原因。所以今後一定要將營養知識作普遍的宣傳與灌輸，方矯以前只知品味，只圖果腹的不良習慣。現在美國的許多菜館，每一樣菜都註明含有某種維生素，份量有多少；所以有人說進菜館，猶如進醫院。這雖是戲謔之詞，但是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營養知識是如何的普遍，一般人民是如何的注意。他們已經有這樣健壯的身體，還在念念不忘的注意營養，我們相形之下，能不深深的驚惕而力圖補救！所以這種講求營養的習慣，一定要養成並蔚為風尚。此外如普通疾病預防的知識，衣食住之衛生化，公共衛生，家庭衛生知識的貫輸，均須積極的展開。

丙、普遍醫藥衛生設備 我國的醫藥衛生設備向來就是微少幼稚而可憐；同時又以

分配的不均，集中在通都大邑，以至能夠享受實惠的人數極為有限，今後除了盡量添增醫藥衛生設備，促進量和質的改進外，尤須力求普遍化，形成全國的衛生網，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都應如網的緯線一樣，每一條不管橫的或直的都是勻稱的相配合。所有的醫務人員也應該放棄商品化的開業制，全體動員起來，在整個計劃之下，平均散布全國，造成爲全民而服務的公醫制。

丁、訓練醫學衛生人材 爲着完成衛生網的設施，爲着公醫制的建立，必須迅速創設大量的醫藥院校及衛生人員訓練機關，大量訓練醫師、藥師，護士，助產士等以應急需。

上面四項是我個國家民族轉弱爲強，洗滌「東亞病夫」惡名的樞紐，要不負一等強國的尊稱，就要以一等的體格作表徵；要能有一等的體格作表徵，就得在衛生的革新及擴展的目標下迎頭趕上，全力貫注的求其實現。

## 八 結 語

中國現在走着復員建國的歷程，今後國家的命運就繫於這一段歷程中的行動。假若這一段歷程中的行動迅速而正確，那麼國家億萬年的根基由新奠定，富強康樂的光輝必能照耀於後昆。相反的，若是遲延而錯誤，則良機瞬逝，時不我待，必將貽後患於無窮。環顧世界形勢，回顧國內情形，凡是愛國有心的人，誰不企求復員建國工作早日完成？誰不希望三民主義的付諸實現？但是，竟有別具懷抱的野心份子，以破壞國家的獨立為目的，以斲傷國家命脈為手段，以無辜為人民作犧牲，使復員建國的工作不能積極的進行，三民主義的實現亦為之阻滯。所以抗戰勝利迄今將屆一年，而真正復員建國的工作猶在發軔之初。從而對於復員建國中主要急務的提出，仍有重大的意義在。絕非明日黃花，更非舊調重彈。

本書所提出的六項急務，表面看來，好像性質不同，各有千秋。其實在功能上，在

效用上都各派各相通，互為依存。在第一章內我們曾將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作為急務中之前提。經濟的，交通的，教育的，衛生的四項工作作為急務中之重點。這就是說，要前提能夠實現，重點才能有所附麗；反而言之，要重點能夠實行，前提才不會踏空。所以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頭尾相接，混然無間的，不特此也，就是前提之內與重點之中，各項工作也是聲息相通，進而相輔相成的。如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就是互為條件的。因為，要軍隊國家化，軍權才能役屬於政權，民主政治才有成立的根基；要政治民主化，軍權的國有才能有確切的保障。至於經濟的，交通的，教育的，衛生的四項工作，走馬看花的一瞥，好像是各有責任，互不相干，如經濟與交通屬於物質的建設，教育屬於心理的建設，衛生屬於生理的建設。但若再進一步的檢討，其功能都是彼此依存的。除經濟與交通的關係；教育與衛生的關係，顯而易見一目瞭然，不用再敘外。我們知道，經濟與交通的建設能夠順利進行，必需源源不絕的有大批心理上受過洗禮和生理上經過陶冶的人材來從事，這就是說，教育與衛生建設的不可少，反過來說，教育與

衛生的建設必需在人民生活有保障，文化能夠互相傳播交流的環境下才能收獲良好的效果，這亦即是說明，經濟與交通建設之不可或缺，由此可見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是相擊湊的。

現在更進一步來分析，我們又可發現這六項要務的核心都有一條堅韌線條，將各個項目的本身加以範圍，同時將各個項目之間連貫起來成爲一個整體，這個線條是甚麼？就是三民主義，茲簡略的敘明如左

軍隊的國家化，是一個民族由紛亂而達到統一的必經過程，要有統一的條件，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才能有保障。但軍隊雖經國家化而成爲整個的國防力量，若人口減少，兵源的補充困難，素質不良，不適合於現代戰爭的標準，那麼這國防力量還是不夠龐大和堅強，不足以保障民族的獨立和生存。因此，軍隊國家化而外，衛生的建設必不能缺。這兩項都可以說屬於民族主義的範疇。

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國家最根本的政治體制，也是一個能夠長足進步的政治方式。但

是，由於民主專講自由，而不講平等，結果民主成爲少數的民主，而並非全民的民主，自第一次大戰以後，歐美這種個人主義已破綻百出，現在更是危機在邇，破綻堪虞的時候。我們殷鑒前車，當然不能再蹈覆轍。所以，我們所謂政治民主化的民主，是自由與平等並重的民主。而不是歐美所流行的民主。但是，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民智未開，封建思想瀰漫的國家，要想實行全民的民主政治，必須心理上先有一番的洗滌，再有一番的培養，才可以推行順利，結果圓滿，因此就不得假手於教育的建設，所以，政治民主化與教育的建設可屬於民權主義的範疇。

人類的生活內容，不外衣食住行育樂六項，這六項的解決，也就是生活問題的解決。如何解決衣食住的問題，那就得從事於經濟的建設；如何解決行的問題，那就得有賴於交通的建設；如何解決育樂的問題，那就得借助於教育與衛生的建設。所以，經濟與交通的建設屬於民生主義的範疇，而教育與衛生的建設也可以同屬於民生主義的範疇。

上面的分析只不過擇各項要務中的要點，將其分屬於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範疇，

以便形式上容易明瞭它們的歸趨所在。可是，由於民族，民權民生是一個完善的整體，三者之間是互為連鎖，互為條件的，因此，實行的方法——六項要務——也應該是息息相通，互相配合的。前面的劃分，完全只是為說明的方便。

歸總的來說，六項要務總目標就是在實行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實行就是復員建國工作的完成，也就是富強康樂新中國之出現。

美國前生產局長納爾遜曾在美華會慶祝中國雙十節的大會中發表演說，內中最精關的幾句是：

「在國際工業和貿易上，我們需要一個旁的國家來代替日本的位置。無疑的，一個民主和平的中國便是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可以提高亞洲廣大民衆生活水準，增加他們的購買力，這樣便可強化國際貿易的基礎，我們應該知道，遠東的貧困和無知，是世界政治的毒瘤和世界和平的威脅，中國的勃興，便可把這種貧困和無知消滅大部份」。

在和平不可分。原罪：中國的勃興，應爲世界和平之一。怎樣算勃興？就在實現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就在實現一個能夠饒貧困爲富裕。化無知爲有知的新中國。如何實現和平與民主？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就是唯一的途徑；如何能夠饒貧困爲富裕，化無知爲有知？經濟的，交通的，教育的，衛生的建設就是唯一的方法。因此，這六項要務的完成，就是新中國的勃興；新中國的勃興，遠東方面才有了安定的柱石；遠東方面有了安定的柱石，世界的和平才有妥實的保證。



